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历史：30周年纪念介绍

彼得· 塔夫（Peter Taaffe）著

一个社会主义世界是可能的

定价 HKD35　NTD135　RMB25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历史：30周年纪念介绍

目录

序言 3

格林斯潘宣告“市场经济”的胜利 3

人口的大迁移 4

全球性反抗的第一阶段 5

“国际” 6

苏格兰社会主义党 7

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背弃 7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USFI） 8

托洛茨基和革命的政党 9

不断革命 10

中国、南斯拉夫和古巴 11

在法国失去的机会 12

今天的革命政党 12

国际社会主义趋势／社会主义工人党（IST/SWP） 14

过渡纲领 15

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选票至上主义 15

马克思主义者在广泛组织中的工作 17

民主和政党 17

社会主义工人党 （SWP） 的改良主义 19

“莫雷诺主义”倾向 20

国际政党还是“邮箱”？ 20

巴西的阶级调和主义 22

即将发生的革命事件 22

参考书目和出处 23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历史：30周年纪念介绍

*工人国际委员会国际书记处（IS）2004年发布

序言

2004年4月是工人国际委员会（工国委）成立30周年。工国委的国际书记处决定再版1997年的小册子《工国委的历史》修订版以庆祝工国委过去30年来在国际范围内为工人运动的所做的各种活动和贡献。客观上，从那时候国际工人运动中充满了各种重要的发展和意外事件。工国委的角色和影响在某些地区和国家内得到了戏剧化的发展，同时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我们看见反对资本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群众组织大规模反对布殊和贝理雅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运动。与之相伴的是工人阶级激烈的斗争；尤其是在欧洲，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反对资本家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损害他们的权利和生活条件；由此在欧洲大陆上引发了一系列的罢工，其中包括一些持续一天的地区总罢工或者公共行业罢工。

考虑到这一情况，工国委国际书记处感到有必要提供工国委对以上事件的最新观点，既是针对这些事件的发展，也包括区别我们工国委的角色和其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行为和观点上的差异。因此，这必然涉及到对于其它组织的政策和纲领的分析，以及将它们与工国委之间进行比较。这一对比的方式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方法，起始于马克思，同时也受到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影响，也就是他们如何对待那些不符合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的需求的思想、趋势和组织。

不得不承认这种分析方式会引起争论而且在“后现代主义”时期被认为显得有些过期。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争论”该词似乎应被换为更礼貌的用语“交流”，这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和他们的信众——前社会民主党人和前共产党领导人们的共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市场”的最终胜利已为他们自动接受，他们间所有的相关讨论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但是事实上，随着政治形势的日益尖锐，尤其是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导致了比上世纪90年代更为紧张的政治冲突。例如随着伊拉克战争的发展，使得统治集团分化成为以美英为首的一边和以德法为首的另一边。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工人阶级对于右翼的劳工运动和工会领导人的背叛而深感恼怒，这导致了工人阶级愤怒地要求为劳工运动提供一支新的具有领导力的先锋力量和对于前进方向提供清晰的阶级分析。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具体什么样式的方式和组织是工人阶级在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而且这是与当前政治形势的特征直接相关联的。接下来，就是涉及到理解最近的历史情况及其如何变化，其中一些具有尖锐特征的情况已经发生或者在下一个阶段即将发生。

1990年代的政治形势被证明对于工国委和其他仍然坚持左派立场的组织，尤其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而言是非常困难的。史达林主义的崩溃导致一个与以前数代人在20世纪所面临的截然不同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近50年来最困难的时期。没有其他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组织象工国委那样能迅速地和清晰地理解柏林墙倒塌后所带来的主要政治特征。随着柏林墙倒下的不仅是史达林主义，也包括东欧的计划经济和苏联。

与现实相反，正如我们将在分析中所看到的对于不同组织的立场的分析，有些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就象政治驼鸟一样不愿意承认现实。他们将他们的脑袋埋在沙里，直到很久以后才承认这些事件意味着工人运动国际性的失败。一些人将它视为暂时性的挫折而不是决定性的失败。另一些将这视为历史性的大灾难，假如不是将这视为永远的失败的话，也认为社会主义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展望在未来的数十年内将不再在需要考虑的备忘录上。工国委认为史达林主义的崩塌是一场失败，而且是严重的失败；但它还没有达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政权在德国、义大利和西班牙获取的胜利而带来惨重失败的那种程度。那次惨败造成了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和它不计其数的牺牲 。

史达林主义的失败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可能性以证明“社会主义”已经遭受到了“历史性的失败”（它们错误地将“史达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由此这给它们提供了机会以进行凶猛的政治攻势来反对社会主义。同时他们在数以千计的不同平台上坚称只有“市场”才能为人类提供永久性的运行机制。这被佛郎西斯·福山进行哲学性的断言为“历史已经终结”。由此他意味着自由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将无法再进一步改进了，这一体系（资本主义体系）将成为社会所可能接受和愿意接受的唯一组织形式。

格林斯潘宣告“市场经济”的胜利

《华尔街日报》作为大企业的走狗并代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恬不知耻地宣称:“我们赢了！”。甚至最近，美帝国主义发言人自夸他们制度的优良也同出一辙，即使他们当下面临着可能比1989年更麻烦和更困难的世界，他们仍然在寻求保障他们自己和他们阶级的安全与利益。

阿兰·格林斯潘——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前主席和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大师——最近在柏林宣布：“我曾经多年参与的二十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关于最佳经济组织结构的根本性的论战。而这已在十年多前柏林围墙拆除的时候，被决定性地解决了。如同苏联一样，整个苏联东欧集团的经济体系在二战前与西欧的市场经济体系在很多方面是类似的。在战后欧

洲的最初四十年，两种不同类型经济的在有限制地相互作用情况下并肩发展，这正如实现了针对不同经济制度的生存能力进行可控制的实验一般。

“作为清楚明白的结果，通过柏林墙的拆除充分表明了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这结果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和广大的。我们可以确信关于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的长期争论已经终结了。的确，仍然有一些人支持旧的社会主义。但对相当多的以前的信奉者现在只不过是倾向于高度弱化的社会主义，是社会公正和市场效率相混合的产物，经常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被舍弃了，它总的来说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和产生负面影响的。不再有针对计划经济的赞美，它们都被停止提及了；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都从社会主义转向了更多为市场导向的经济制度。”[1]

然而，面对日益迫近的世界经济的崩溃和由入侵与占领伊拉克所引起的灾难性的大混乱，格林斯潘那些评价无非是在黑暗中吹口哨以鼓舞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他的评论是属于1990年代的早先时候。在1990年代的某一个阶段，社会主义的政治觉悟——尤其是在工人阶级内的广泛理解——毫无疑问地被抛弃了。虽然意识被削弱了，但工人阶级的基本潜在的力量仍然存在而未损伤。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并不象在1930年代时候一样有利于统治阶级。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战毫无疑问地在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上有实质性的效果，从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权利和条件。然而，在硬币的另一边是与“自由资本运动”相关联，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已经降低了国家间的障碍。这导致资源从一个国家和一个大陆迅速移动到另外一个国家和大陆。所有的这些迫使工人阶级从一个大陆甚至世界的范围内考虑问题。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为一个未来的新国际主义准备了客观基础,作为第一个可资证明的案例，即在1990年代后半期和本世纪初的早些时候所进行的强有力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

从伦敦到西雅图，从布拉格到发生在热那亚和哥德堡的历史性的血腥的冲突，在尼斯、魁北克、派特阿杰、巴黎、孟买，毫无人性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和对残暴的全球化盲目崇拜已经被唾弃了。直接看来，青年人对未来的期望以及他们行动上的转变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而且在一些方面也被工人中的重要阶层所支持。进一步看，这种新的国际主义被打上大陆和全球范围“人民”斗争的标签，但是阶级分歧最终会在一个阶段暴露出来。卡尔．马克思是在他那个时代中第一个认识“全球化”的先驱者，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与它相关的世界工人阶级也产生了“世界历史”：“无产阶级…只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历史性的存在，正如共产主义和它的运动也只有能在世界范围内历史性的存在。”[2]他进一步说明：“随着市场延伸成为一个世界市场，使得世界范围内的运动变得可能，而且日益成为事实，从而推动向一个新阶段的历史发展。”[3]

相比今天，当时世界劳工分工的发展导致的世界性的相互依赖尚处于“幼年期”，而且很大程度上不为当时的大多数人所认识。

人口的大迁移

今天的情况有何不同呢？通过互联网、卫星电视、24小时新闻和海外旅行等等，世界被联结在一起，并成为可以被多数世界人口所能感知和认识的真实世界！电视和行动电话在星球上一些经济上最不发达最贫困的地区都变得越来越普及。

是马克思的“混合和不均衡发展”的规律的反映，最新的科技与技术伴附着封建和半封建的社会关系上。技术被应用到了众多经济不发达地区，即使这些地区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族和民主革命”。这些革命包含彻底的土地改革，国家的统一和在现代意义上社会的发展，这一革命早在数百年前的欧洲就被资产阶级完成了。但是在大部分的亚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掌握权力然后动员他们身后广大的农村人口，然后建立工人政权——一个工人和农民联合的政府来完成。这将引导在国家，大陆和世界的范围内推行社会主义措施。这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的本质。这些贫穷国家长期被资本主义控制下延续着封建，半封建和陈腐的社会和落后的经济关系，这一理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其有效性。

人们绝不可能漠然置之而默许社会的停滞和堕落。通信科技扩展到世界各范围，意味着当绝大多数人还在贫困之中遭受折磨之时，少数一些人更好的生活状况将展现在大众的面前。它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口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人群或者说那些拥有足够资源的人群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磁石”，使他们寻求途径前往可获取更好的商品和更高的生活水准的欧洲，日本和美国等地。因此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移动，人们藉由任何可能的机会从贫困缺乏的区域逃离，或者由于战争和迫害所驱使而被迫离开家园。

资本家对这一现象的反应是伪善和矛盾的。他们被迫仰赖移民来填补低工资的血汗工作，并试图弥补技术差距。通过较年轻的移民的流入，他们也可以此来弥补人口老化的情况。同时，资本家还以移民作为替罪羔羊来遮掩他们制度上的痼疾。提出“欧洲堡垒”的概念也是尝试着超越欧洲的极右派的主张，因他们已经威胁了一些主流资本主义政党的选举地位。

然而，当移民打开了进入先进工业社会的大门的时候，一个逆向过程也正在发生——一个大规模的工作“重置”，大量的制造行业和最近产生的“服务”行业职业正在转移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不发达”地区。 这现在也包括东欧诸国，就算不算上俄国。这一情况尖锐地引起了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工人表达自己纲领的需求，特别是工会们需要保护国内工人们的工作以及捍卫移民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来反对这种有害的“外包”工作。这不过是资本家“利润最大化”这种根深蒂固驱动力的最新表现而已。他们所列举的理由，在一部份情况中也正是如此，以制造业中数以百万计相对高收入工作的丧

失为代价，而由临时性的较低工资的所谓“服务”行业所替代！我们以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工人的命运为例；三分之一的西班牙劳动力处于临时合同的雇佣中，而且合同之间平均有十天的空余！

这导致的结果是工人阶级中相当重要的部分陷入贫穷。从前在相对高收入和雇佣保障方面具有来之不易权利的的工人已经被一队贫穷的——不仅仅失业而且是“在职贫穷”——劳动大军所替代。这将导致在低收入和贫穷的工人阶级产生大量的反抗。这一情形的发展可能会沿着英国十九世纪末期燃气工人、码头工人和火柴工人反抗的方向发展。这可以对应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在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等所发生的类似运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教士们”的观点是全球化的过程是无情和不可改变的，它是不能够被停止的。而且，无论在新殖民世界还是在世界经济的工业化地区（现在变成去工业化）中，它将会最后藉由在新的行业中创造新的工作而益于每个人。

请将这个理论告诉墨西哥加工出口工厂（Maquiladores）的女工们吧。贪婪的的老板偏爱女性劳工，通常是单亲母亲，因为她们是最没有能力通过罢工行动来抵抗资本驱动的减薪和工作条件的冲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支持者们——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主张说协定将给北美和中美的工人阶级带来相互的利益。但事实相反地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作被重新安置到墨西哥，虽然据说这些工作“有利”于墨西哥工人阶级，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条件反而恶化了。

从他们切身的经历，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的想法，雇主不应该被允许像一个孩子关闭火柴盒一样儿戏地关闭工厂，或者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随意将生产设备从一个国家或大陆转移到另外一国家和大陆。

我们需要为不同国家的工人建立共同政策并将其植根于工人阶级中——举例来说，在欧洲在下个阶段通过工会来协调共同的工资。相同的过程也将会在中国、印度和其他地方的工人间发展起来。他们已经开始强烈地抵抗企图过度剥削他们和他们家庭的新的贪婪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在工业化的版图上产生的新的国际主义也将相应地出现在政治地域内。虽然仍然在蹒跚的摸索之中，但他们已经开始作出各种努力以寻求与国际的、整个大陆的和世界政治范围内的抵抗相联系。虽然他们仍然是乌托邦的概念，甚至例如像英国环保作家乔治·梦贝尔特（GEORGE MONBIOT）所作出的提议建立“世界议会”（在他的书《共识的时代》中有概略说明）以检查和控制资本主义，但这都显现出了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中所提出的对于现存的问题的各种国际的和政治的解决办法。

而这一个过程在1990年代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产生的巨大贫富间两极分化下进一步加速。2002年地球上的最富有的十个人所共同持有的财产为二千六百六十亿美元。这是 富有的国家向贫穷的国家提供的所有年度援助的五倍。这差不多足够支付完成联合国的“千年目标”的所有目标，像是遏制和限制爱滋病、疟疾和其他的传染性的疾病的传播，减少婴儿死亡率三分之二和从现在到2050年间降低分娩中母亲死亡量的四分之三。

统计资料充分地表明世界贫穷程度的深度和广度。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都知道全球有一半人口每天依靠2美元或者更少的费用来维持生活，五分之一的人口的每天依靠少于1美元的费用来维持生活。尽管全球范围内食物存有盈余，但仍然有八亿四千万人被官方确认为营养不良的，原因在于他们缺乏足够的金钱来购买充分的食物。在世界各处有一亿八千四百万人处于失业中（这数位已经排除了那些“就业不足”人口）。世界银行估计，有54个国家总共七亿五千万人口的实际收入在过去10年中减少。

这个星球上的真正权力被500个个人所控制（其中多数为富有男性而少数是女性）。他们控制了多数的生产资料——劳工、科学和技术组织等等，世界资本主义的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如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同盟所支援——成为世界最终需要服从的力量，并通过市场的所谓“看不见的手”反映出来。国家政府似乎无力对抗这些“投资者”，在这个新的解除了管制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他们能够迫使各地政府向他们曲膝，除非政府跟随他们像顺从的狗一样。美国的克林顿总统处于市场的压力下，尤其是政府债券的买主的压力下，被迫在1993年放弃他温和的改革计划。克林顿将他自己变成了“艾森豪的共和党员”，从而满足这位前总统所说的那些“债券交易商杂种”。[4]

全球性反抗的第一阶段

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运动代表了国际性反抗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一阶段。

它所带来的巨大益处是动员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尤其是年轻人们首次参与行动。并非所有参与这些运动的人们都是有意识地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初他们仅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生活水准、环境、日益的军事化、发动战争的影响和由此制度而为人类所带来的恐惧未来。

迄今为止，劳工运动和工人阶级参与反对资本主义运动还通常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或者拥有自己的政治旗帜。这是因为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工会右翼领导人在前工人阶级政党的支持下所起到的作为资本主义“防波堤”的作用。然而，我们不应高估这一运动，而应该通过其而窥探未来工人阶级群众运动的景象。工人群众的运动会有更高的觉悟，意识到资本主义是继续进步的障碍，而且工人会本能地提出阶级诉求，作为世界上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

反对资本主义运动集中于反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源于这一运动的众多领导人的政策。他们不相信他们能够直接攻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希望引导到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某一方面进行批评。因此

一些人，如英国著名环保分子梦贝尔特将批评聚焦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联合国。当运动中的一些积极参与者建议对这些机构进行大力的“改革”的同时，梦贝尔特显示这些改革实际毫无用处。虽然梦贝尔特在对制度进行如此尖锐的批评，但在实际效果上他仍然退缩了，仍然试图在制度内部中寻找解决的途径。

当梦贝尔特和运动的其他领导人被阻碍而没有进一步前进，数以百万计来自底层的人民参与的运动已经跨越了这一界限，在未来它将更进一步发展。运动的活跃分子正在寻找一个政治纲领和思想以建立一个真正“不同”的替代世界。这将不是一个改良的资本主义纲领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群众运动导致在社会内所有阶层的政治觉悟的深远的变化，尤其是对于年轻人们。马克思主义者一贯指出战争是“革命的助产士”。例如日俄战争成为1905年俄国革命的先导，一次世界大战成为1917十月革命的前驱。虽然迄今伊拉克战争还没有导致一场革命，但在伊拉克发生的大规模抵抗以反对占领潜在的成为了一场革命的开始。在被一系列令人激动的事件所推动导致的人们的激进的观点中，它已经引起了一场革命或者是革命的开始。许多人在脑中提出了对替代选择的需要，其中的一些倾向社会主义。

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中实现这个在运动中越来越多阶层所追求的“新世界”。历史，包括近来的历史说明，这不可能依靠自发或者半自发来实现。整个20世纪是由工人阶级英雄般的运动，革命和反抗，并最终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权力所记录的。在一些案例中，权力从工人阶级手中滑落。例如1936-1937年的西班牙，最初整个国家的五分之四在工人阶级的控制中。1973年的智利，在阿连德时期，整个国家的40%的土地和工业被从私人手中获取过来；1975年的葡萄牙，来自于底层的群众运动迫使政府对银行进行国有化，通过银行的国有化控制了全国70%的工业。工人阶级失败而交出权力不是完全因为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而是由于他们的组织，特别是组织的领导人，即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人，被证明是运动的障碍。几乎在每个实际案例中，这些领导人不是通过革命来寻找方法满足工人阶级的需求和要求，而是直接将权力交还给资产阶级。

“国际”

所有这些运动都是本能的国际主义的——在国际范围内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带来的结果是从世界工人阶级中获取巨大的支持。

从作为一股力量的一开始，工人阶级就不仅是在国内的范围而是在国际范围内寻找解决的方法。1840年代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了共产主义联盟，而当时英国的人民宪章运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的工业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还存在。事实上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获取政治权力曾经有过5次不同的尝试：共产主义联盟，国际劳动者协会，也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社会主义国际（第二国际），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和随之而来的是俄罗斯革命，以及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正如我们解释和说明工国委的历史，所有这些组织在提升和促进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政治认识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是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当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它的衰败，同时全球化提升了对于真正的国际主义和一个国际组织的需求的时候，目前却没有一个基于群众性的政党基础上形成的大规模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性国际组织。工国委的任务是帮助创造条件来形成这样一个国际组织。但是这只有建立在对过去历史上经验教训的学习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尤其是对于以前国际组织失败的教训的学习。建立这样一个群众性国际组织的重要一步是在各个国家范围内建立群众性政党。直到这样群众性的政党产生，那么国际性组织的框架才会产生。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群众性国际组织的的胚胎只有在爆炸性的时期到来时才能够产生。我们相信工国委能够在这一过程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政治版图中残留各种失败尝试的遗迹和想成为“国际”的组织（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他们中的一些在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之中只有很肤浅的根基。许多这些组织结构都是破碎的。许多中他们其实是功能上的机会主义或者极左派。很不幸，当中许多的组织还打着“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我们曾经在1997年的《工国委的历史》一书中解释过为什么托洛茨基在1938年发起的第四国际的原始概念没有能够发展起来。它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力量，尽管在1970-1980年代在一些地区，如斯里兰卡，拉丁美洲，越南，法国和英国，托洛茨基主义曾经在劳工运动中有过强有力的影响。第四国际之所以没有成功的原因在于恰不逢时的客观原因和困难与后来第四国际领导人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相结合而造成的。

但是21世纪为向过去历史学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这个为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而准备基础的过程——至少是部分步骤——可以开始发展。但首先这是一项政治性的任务。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建立这样一个与其他组织不同的政治组织的唯一理由是在于政策和政治纲领与其他组织的重大不同。而偶然、次要、个人乃至策略上的分歧并不是维持不同组织的正当理由，尤其是当这个组织的成员达到了数十，数百甚至数千为计的时候。

由于这个理由，随着柏林墙的崩溃和新状况的产生，工国委曾经试图寻求与其它托洛茨基主义的派别在基础问题上达成协议。我们与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USFI）进行过讨论和联络。我们与“莫雷诺主义（MORENOITE）”派周围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进行过联系，他们大部分都在拉丁美洲。我们试图且现在仍然在努力（很不幸没有取的什么成果）与国际社会主义趋势（IST）建立共同的组织和联盟，IST的主要力量是英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WP）。我们以开放的方式进行这种讨论，正如我们所做的和所希望的是这些组织能够从中认识到他们过去的错误，重新调整他们的政治立场；从而为共同工作并可能就当前的政治协议创造条件。

但是很不幸，大部分这些组织面对新的世界形势在对于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运动问题上的结论与我们的有所不同，而且有些是决定性的不同。以柏林墙倒塌为象征的史达林主义的失败是这些决定性不同的一部分，除非有正确的评价，否则这会导致错误的政策，纲领和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没有一个能够象工国委一样快速和清晰地对于后史达林时代的主要特征作出相应调整。

苏格兰社会主义党

随着史达林主义的崩溃而来的“可怕的九十年代”是许多组织机会主义变化的客观来源。

令人意外的是工国委内部的发展——后来成为苏格兰社会主义党的领袖人员使运动开始偏离革命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不知不觉地鼓励了这一个过程。苏格兰社会主义党（SSP）的建立和选举的成功现在已经为那些轻率地想从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退却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范本。在1990年代晚期在工国委苏格兰支部的领导决定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主义组织——苏格兰社会主义党，而实际地抛弃了革命政党，代表了与工国委的革命纲领策略和战略根本性的决裂。这一发展是由一些过去在工国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个人，如汤米·雪利丹（TOMMY SHERIDAN），阿伦·麦可比（ALAN MCCOMBES）和其他人造成的，但这不是一场意外。这是在激烈变化的政治气候下，继续主要革命纲领和立场所面临的困难之产物。

这些同志的提议在最初阶段与我们的分析和纲领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毕竟，它是工国委的领导层而不仅是苏格兰支部的领导层雪利丹和麦可比，他们最初号召建立一个新的群众性政党。这是基于我们关于英国的社会民主政党（新工党）乃至最终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民主党派发生了“资产阶级化”。尽管麦可比和雪利丹试图将工国委多数派描绘为抵制建立广泛性政党的想法，但是这一论据没有对工国委大多数成员带来影响。

我们所反对的是他们以这一形式放弃革命的路线。关于这些概念和围绕这些概念所发生的争论可以通过工国委的网站（www.marxist.net）以充分地了解。面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工国委的领导层在压倒多数的工国委成员的支持下正确地预言这些此后成为苏格兰社会主义党领导层的政治演化的必然趋势。尽管他们否认这是他们的目标，但正如我们所预测到他们在政治上的堕落和他们的最终滑向苏格兰社会主义党。这在实际上介入向改良主义的转化，也等于宣告本来作为革命政党的苏格兰战斗派工党的终结。在开始阶段，当麦可比和雪利丹在苏格兰社会主义党内部建立国际社会主义者运动（ISM），这一现象还并不明显。然而，在2003年1月，领导层提议解散国际社会主义者运动，因为苏格兰社会主义党正在做“需要做的工作”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该提议由于那年的苏格兰国会选举而暂时被冻结。但在当年十月这一问题再被提出。领导层同意继续保留国际社会主义者运动，但在苏格兰社会主义党内部没有什么热情去建设它。他们之所以需要保留这无组织的外观，是因为来自国际社会主义者运动内部的政治反对派和因为这么做会导致在苏格兰社会主义党内部的其他政治平台可以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尤其是相对于工国委而言。真相是国际社会主义者运动事实上还是苏格兰社会主义党领导层中的多数派。

尽管苏格兰社会主义党部份地填补工党左翼所遗留的真空地带，在选举中取得一定的成功，而且成员人数也有所增加。使它更进一步提高知名度是它在2003年的苏格兰国会选举成功，并且使苏格兰铁路、海事和运输工会（RMT）成为苏格兰社会主义党成员。作为结果，这一现象被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左翼”看做是如何建立新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基础的范本。在实践中，因为过分强调在需要上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上，使革命组织淹没在这一新的组织形式中。这似乎被苏格兰社会主义党的成功所证明。然而，显然人们忘记了所有这一切是在苏格兰内有限达成的。假如关注在当地的具体条件和在其他地区的不同情况，这意味着不可能立即建立一个苏格兰社会主义党式的政党。毫无疑问地，民族问题在苏格兰的政治领域是个尖锐的问题，而苏格兰社会主义党已经从中获益。但是在英国和威尔斯的社会主义党也在选举中拥有良好的记录。社会主义党（工国委英格兰及威尔斯）成功地在十一个地区选举中获取自己的位置，从而有了社会主义市议员的当选和连任。自从2001年以来，在考文垂地区大卫·纳里斯（DAVID NELLIST）获取的当选胜利成为相对新工党的左翼政党在英格兰和威尔斯所获的最好记录。而且，当苏格兰社会主义党在2004欧盟选举期间在苏格兰获得值得注意的5.2%份额时候，在相同的欧盟投票中社会主义党（工国委爱尔兰）在都柏林的爱尔兰选举中获取了5.5%的份额。这些选举结果强调了事实上不放弃一贯的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纲领也能获得选举支持。

我们欢迎和支持苏格兰社会主义党的建立——尽管我们反对该政党领导层的错误主张（较多的细节请见www.marxist.net）。但是我们坚持在苏格兰社会主义党内部继续维持和建立有清楚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派别。这是与1990年代的所设立的战术相符合的——捍卫和恢复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并且与此同时，在这些组织内继续保留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建立新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的双重任务。

苏格兰社会主义党领导层坚持了第一项任务但放弃第二项在这个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极其重要的任务。由于丧失耐心——为在短期内获得支持的期望所驱动，他们放弃了在工国委内他们曾经坚持的原则。今天，无论他们还是我们，也包括任何在国际运动中认真的组织都不再将苏格兰社会主义党领导者视为坚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尽可能表明今天的立场与他们在战斗派，苏格兰战斗工党以及工国委中革命的过去所处立场之间的差别。

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背弃

雪利丹的演讲内容并非一贯保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例如，作为苏格兰社会主义党的会议召集人，他在

英国广播公司上的一次采访中解释：“有一些国家成功地将公有制和高税收制度混合起来...例如挪威和丹麦，他们设法将对富有者的高税收和高水准的公有制混合起来。”

暗示了资本主义的挪威和丹麦是雪利丹希望见到的苏格兰的范本。他然后继续说道:“我不认为有需要要立刻使特易购（TESCO）国有化。我认为需要的是在特易购执行合适的工资和雇佣状况。我们需要做的是为商业设置规则，你不一定要拥有它，你需要的仅仅是管理它。”（《先驱报》，格拉斯哥，2003年4月30日）

在相同的采访中，雪利丹说:“我们正在说的是一个未来的社会主义独立苏格兰，我们希望进行专业训练和技术培训的工作。我们想要提供一个高技术的经济，为大企业提供富积极性的劳动力。如果那能在德国和法国运作，那里他们能有较高的薪水，较好的生活标准而且生产较好的产品， 为什么不能在苏格兰奏效呢?”

姑且不讨论雪利丹希望为大公司老板们提供“富积极性的劳动力”， 在德国一些工人们每小时只挣2或3欧元，法国工人的工资和雇佣条件处在总理拉法兰（RAFFARIN）的新自由主义纲领攻击之下，这难道就是他们讨论的“高收入”！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下，“高收入”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在变成过去的历史。

苏格兰社会主义党的报纸《声音》，凯文·威廉逊（KEVIN WILLIAMSON），一个接近雪利丹和麦可比的合作者站在没有阶级概念的“自由”的位置（他们也没有就此作出任何评论）“那些纯粹从政治角度地以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来判断的人们还没有作任何认真的尝试来解释如何才能阻止一个统治阶级在后资本主义家社会中控制国家权力。而其余的我们需要在前进中寻找实际的可替代的选择。”

这些相同的蜕化—比较与他们在工国委时候的立场—表明了苏格兰社会主义党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这一趋势表现为，对于卡斯特罗的古巴毫无批判的支持，他们将卡斯特罗称为“社会主义者”， 对巴勒斯坦 - 以色列冲突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对的解决办法—即在中东的社会主义联盟的框架下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巴勒斯坦和一个社会主义的以色列。在效果上，如2002年的苏格兰社会主义党会议中，他们接受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错误口号：“一个巴勒斯坦国和支持以色列人少数族群的权利”。虽然在后来的会议中这一个立场被软化了，但在苏格兰社会主义党的报纸和和苏格兰社会主义党领导人的公开演讲中，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人少数族群权利的概念仍然会出现。如此的抽象口号永远不会被以色列人所接受，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被解散，而他们被强制地并入另外一个“巴勒斯坦国”。

在本文写作的时候，因为沙龙当局的残忍和镇压政策，在绝望的巴勒斯坦地区，多数的巴勒斯坦人面对营养不良和饥饿的现实看起来已经抛弃了建立“一个国家”的希望。一部分巴勒斯坦资产阶级已经放弃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主意，而以希望在以色列国内为巴勒斯坦人争取平等的权利而努力所替代。这一希望是建立在人口统计学的基础上的—巴勒斯坦人口有更高的出生率，以色列犹太人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时间内将会变成他们自己的国家内的少数人口!当然，以色列资产阶级永远不会接受如此的解决方案。如果必需的话，他们倾向于会强行驱逐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重新分配地区。换句话说，一个延伸的永无止境的血腥冲突将成为任何“单一国家”的提议的结果。但令人讽刺的是这也适用于沙龙提议的为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类似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似的“班图斯坦”的真正的“二个国家”的政策。虽然在目前的短期内，社会主义的思想看来是暂时淡化了，但从长期看来，最后它将会得到多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口的支援。

苏格兰的前工国委成员在政治上、理论上而且组织上的逐步倒退成为影响其他类似的曾经宣传是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的相同转变过程的标志。他们其中的一些仍然正式宣称是在“革命的左派”和甚至“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 对于澳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党（DSP）、国际社会主义趋势（IST）和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而言，苏格兰社会主义党领导人所选择的途径也成为他们向右转的“灵感”甚至是当做一个“范本”—由此可知这种类型政党的原型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建立起来。

从卡尔·马克思的时代起，科学社会主义，用托洛茨基主义者今对它的表达，根据《共产主义宣言》的原文来描述，一直将它看作是“现在的运动中的未来的运动”。当它总是与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理解力的真实水准相联系的时候，那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纲领、手法和组织等议题上的任务是与工人阶级中更为先进的那部分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关注是直接相关连的。这必然地导致了在一贯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左派改良主义的，甚至与温和中间路线之间的思想和方法都会在社会冲突尖锐时期变得清晰起来 。那些希望追随苏格兰社会主义党领导人脚步的组织和党派事实上是牺牲了工人阶级的未来来换取今天的眼前利益。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

在整个国际的范围内，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UFSI，下称“第四国际”）对于苏格兰社会主义党充满期待，而且苏格兰社会主义党的行动越来越多的符合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

他们也许是被最广泛认知国际性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然而，“第四国际”，正如它自己所承认，在2003年它的世界大会上有来自40个国家的参加者（并非所有的参加者都是“第四国际”的成员）。这与目前工国委在世界各地的支部，组织和成员的国家数目类似。当“第四国际”通过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LCR）在法国拥有相当的势力的时候，这并不适用于大部分其他的西欧国家。不同的“革命左派”的国际组织的力量的问题不仅是对于当前力量的分析也是对于其潜在力量的分析。这依赖于按顺序地对于一个社会和工人阶级

所正在经历的和由此而带来的各种政治结论的正确分析。一个组织是否拥有数十，数百，数千甚至数百万成员确实关系到它所能有的实际效果，但最终和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情况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这些组织的政治理念。除非在一个组织内部的或者不同组织间的双方存在不能够互相容忍的政治立场的导致无法在一个组织共存或者无法合并两个不同的组织，否则形成或者维持不同的左翼政治组织是一种犯罪。同样地，一个革命政党是不同于任何形式的广泛的政治联盟，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组织，路线，其中一些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时候，大家都是能够互相协调和合作的。

团结的需要来自于工人阶级联合自己的力量以反对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的基本要求和倾向。任何政党或思想流派反对这种团结的诉求都是会带来灾难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总是寻求共同的基础组织，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中有真正的基础组织，和在特定的行动中联合处于前线的参与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以隐藏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或者弱化和不推动马克思主义纲领的进步为代价，各个不同的“国际组织”的未来取决于他们现在和未来的政治路线，以及他们的思想对于现实状况是否能满足需求。

国际社会主义趋势和“第四国际”都在一个相当的阶段内没有推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分析。“第四国际”，宣称完全忠实于托洛茨基的理论，在知识份子的圈子内被视为“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的代表。然而不幸地是这并非真相，我们将对“第四国际”的现状和纲领进行分析和考察而展现出来。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为了承担这一名称需要捍卫托洛茨基的遗产，他的分析方法，和整体上他在工人运动中活动。但这绝非意味着无条件地接受托洛茨基所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在“第四国际”的杂志《国际观点》最近刊登的文章中出现了一系列对托洛茨基和他的思想与方法批评和攻击。与其说他们引用的内容是托洛茨基所犯的错误—即他在一生中公开地承认的错误，而不像“第四国际”和它的领袖今天所不愿承认的—倒不如说“第四国际”的作家攻击的“错误”是他不曾犯过的；他们所指责的恰恰是他的优点而并非他的弱点！他们如此所做的，可能恰是无意识地附和史达林主义者对于托洛茨基所谓的“弱点”的批评。

托洛茨基和革命的政党

例来考量建立一个政党需要的疑问。“第四国际”的书记弗朗索瓦·维卡门（Francois Vercammen）写了一篇题为：“党派的问题：托洛茨基的弱点”。

卡门批评道:“他的弱点是政党的问题...托洛斯基没有能力（1903-1917）或者机会（在1917之后）直接地参与革命党派的构建，在主要方面（超越总的分析和远景），也就是对党派的政治联盟和具体手法的苦心经营和实行，在中央领导层的集体工作，在政治组织结构的建立，与其他干部和斗士一起工作，在一个苦心经营的政治联盟内针对党内的斗士优先进行内部交流的实践。在1903年到1917年间，当与列宁分手后，他并没有试图组织一个组织或者党派（而把自己限制在作为一个记者和演讲者进行活动）。”[5]

这一对于托洛茨基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RSDLP）内的位置的难以置信的误解反映了资产阶级用一种“社会学的”的方式对革命进行解释并对托洛茨基进行批评，而且这也反映了史达林主义者的中伤。托洛茨基的弱点并非如维卡门所宣称的—这对政党的特征和需要的错误理解。他完全参与了社会民主工党的活动，这要求在那一个阶段了对一个党派的特征和需求进行理解。维卡门在“总的分析和远景”中忽略了托洛茨基对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主要贡献—在他奠基性的工作—《结论和展望》中解释而且发展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在这一方面，托洛茨基正确地预见了参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俄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尤其工人阶级的决定性力量作为主要力量与农民结盟从而能在1917年10月取得政权。

托洛茨基的错误——公开地为他所承认的，在他的《流亡日记》中举例说明——不在于党的问题或对党的需求，或者对于党派的特征等等；而是关于他的“调和主义”，在1907年和1912年之间，他希望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间能达成和解。他希望，正如在1905年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大众的压力下被迫合作。附带一提，在这个问题他绝对不是孤独的。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各个级别的成员在1906年和1912年之间，在一些场合向列宁身上施加众多压力，他被迫与孟什维克进行“联合”谈判。而且直到1917年9月，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党员在俄国（除彼得格勒外）的许多地方都在统一的组织中。不像这些具体的“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从未接受来自孟什维克的政治幻象，而是尖锐地并且广泛地分清了布尔什维克与他们之间在政治纲领和远景上的分歧。因此，在孟什维克政治特征的描述上，托洛茨基站在列宁的这一边。所以我们在此重复，托洛茨基犯的错误不是在于建党的问题上。他的错误在于幻想社会民主工党的两翼在大众的压力下被迫联合起来，并且接受他在不断革命论中论述的政治路线和由此而来的战略和战术进行革命。而列宁在另一方面则更早和更清晰地认识到孟什维克对于即将到来的革命已经开始倾向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理念。

尽管列宁的直觉更早和更清晰，但托洛茨基在对于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分析更为确切，尤其是工人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主要代表力量带领和引导农民大众来获取政权。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列宁在二月革命及以后的时间内，事实上抛弃了二月革命后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而在实际操作中完全采用了托洛茨基的立场。

在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关于革命的路线，战术，战略等没有什么本质上不同的地方。而史达林，加米涅夫或季诺维耶夫则跟他们不同。维卡门写的是相当荒谬地：“是列宁的决定把他自己和俄国‘真正的运动’相联系起来，并且与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危机相结合，而这些都风行并植根于在'城市的'俄国社会的布尔什维克中。这里具有决定性的是列宁的政策而并非是他的关于党的“概念”，例如普遍了解（民主集

中制，总纲领）...这是托洛茨基的政治弱点，是基于他在组织水准上的失败。一个人能够根据以下的方式所列出：在1917年之前，他用他非同寻常的能力抓住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向并且提出了战略性的展望但未能发展出一个革命性的政策（而且他不能或者不愿意创建一个战斗的团体）。他在党建的弱点在于这一框架之上。”

而且仍然如我们描述过的，与其说是列宁不如说是托洛茨基对于革命力量的远景和俄罗斯革命的后果有着最清晰的认识。维卡门相当正确地赞美列宁关于1917年的政策—然而却说这是“托洛茨基的政治弱点”。而关于这一切的全部内容，我们已经在以前许多次史达林主义者对托洛茨基的攻击而进行辩护!而他在近来这些日子对于托洛茨基所谓错误的批评来源于“第四国际”自身没有能力在过去建立起相当规模的组织。维卡门指出他的组织在1965-68年间的失败，并且与1895-1914年时期进行比较，当时列宁能够建立起一个革命党派的框架并使之成熟而且最终在1917年10夺取政权。然而不幸地是维卡门误解了1965-68年时期的整个特性以及其中不同的危机。他宣称1968年5月事件之前史达林主义和社会民主派已经开始“分裂”了。 但这不是真的。修正主义组织和其他有觉悟的组织总的来说仍然在那时候用他们共同行动控制着当时大众的思想。对于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社会民主派和群众性的史达林主义政党是客观存在的因素，只能通过各种事件所克服。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正好是发生在1968年5月-6月间法国的一系列革命事件。然而由于当时群众性革命党派和领导人的缺乏使得史达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和修正的“社会主义者”能够重建他们的控制和使潜在的革命脱离轨道。

在英国1970到1980年代，战斗派——社会主义党的先驱——在利物浦和反人头税的斗争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然而不幸地是，如同我们在其他地方解释过的，这个大有希望能够建立群众性革命政党的萌芽被1980年代的经济繁荣和史达林主义的崩溃所摧毁。将维卡门对于托洛茨基角色的重新描述和所谓的托洛茨基关于组织和建党的“弱点”，和他的转化后的政治批评相结合，事实上是由于没有耐心而背叛，走上目前组建这么一个政党和这么一个力量的道路。这一任务包括理解在不同的阶段工人阶级和它们的政治理解能力，意味着某些特定的阶段反对潮流，甚至冒着被控告是宗派主义的危险。但是这也意味着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组织架构，将党植根于工人阶级的环境和组织中——如工会和合作社等，并寻找机会，在时机出现的时候建立起群众性或者半群众性的基础。

不可置信的是，维卡门指责托洛茨基“在支持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选举的问题上是‘既不坚定的也是混乱的’（甚至在1905年之后）”。 但是维卡门没有做任何尝试去解释他意谓着什么。然而当涉及到农民问题的时候，他直接地攻击托洛茨基和藉此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的主要成份之一进行攻击。维卡门说道:“在1906年及随后的数年中，他满足于自己在那个时代（后马克思主义时代）在欧洲马克思主义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二个理论性的概括：历史性的看，农村会跟随城镇，农民会跟随无产阶级（工业化的，城市化的）；同时，农民没有能力建立一个自治的政治路线和建立一个独立的组织”。他继续附和史达林主义者和近来澳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观点（DSP）的理论上的“史达林主义者”的批评，并论述道：托洛茨基并没有象列宁那样去寻求建立真正的工人和农民的同盟并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由于理论抽象的特征，为托洛茨基提供证明了一个真正的圈套。”[6]这不过是附和了史达林主义者的所谓托洛茨基“低估”了无产阶级革命潜能力量的论点。

不断革命

蜜雪儿·罗伊（MICHAEL LOWY）在《国际观点》上也表达类似的观点，据说是为了给不断革命理论进行辩护。

其写道：“不断革命的理论在20世纪历史期间已经被检验过两次。在一方面，由于阶段主义导致引起的灾难，来自于在独立国家中的共产党们盲目应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和史达林主义的分阶段革命的教义，这发生在1936年的西班牙，1965年的印尼和1973年的智利。”[7]

罗伊然后继续说理论也在另一方面被查证，“因为这一理论，正如它在1906年形成时那样，主要使我们可以预测、解释而且弄明白20世纪发生的革命，在周边的国家中发生的全部是‘不断’革命。所有在俄国、中国、南斯拉夫、越南或古巴所发生的，在其宽广的主题上，都与托洛茨基的中央思想所联系：混合的和不间断的革命的可能性——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发生在一个边缘资本主义的国家、依赖性经济的国家或者殖民地国家中。整体来说事实上，1917年10月革命之后的革命运动的领袖们并没有认识到此后这些革命“持续不断”的特征。（其中有一些例外，如埃内斯托·哲·古华拉），或是后天做的而且应用于不同的术语之下，而且从这一历史性的有效联系中什么也没学得...

“今天就如昨天一样，在各个社会的议程中所发生的革命转型都发生在系统周边的国家而不是系统中那些中心国家。在印度发生的社会革命无论是从它的纲领，战略和主要驱动力是不同于在英格兰发生的纯粹的“工人革命”。决定性的政治角色——当然不为托洛茨基所预见！——在今天的许多国家中是本土的农民运动（如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EZLN）、巴西的无地工人运动（MST）以及厄瓜多尔原住民族联盟（CONAIE）等，它们充分显示了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和爆炸性以及与此相关连的民族解放。）[8]

这两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第一，托洛茨基了解动员农民的重要性，特别地在俄罗斯无产阶级仅是一个极少数力量。但他是绝对正确地判定农民阶级是多元的而且也没有能力去独立获取政权并维持这一政权。在某种意义上，罗伊是正确地指出中国、南斯拉夫、越南和古巴发生的革命的胜利验证了不断革命论。但这些胜利并不符合罗伊的经典的感觉，而只是一个歪曲模仿的讽刺画。除了俄国在1917年之外，工人阶

级没有能直接地获取政权，或者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如苏维埃等。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所领导的波拿巴式的军事派别引导下动员广大农民取得政权并在不同的阶级间保持平衡，因而建立了一个没有史达林的史达林主义政权。

而这一切都没有在“第四国际”对于这些国家建立过程的分析中所体现出来。因此他们在“农民”的问题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正如我们在《工国委的历史》中所描述的，这造成了“第四国际”过去在游击主义战术，和农民在革命中的角色等一些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并导致“第四国际”支持在乌拉圭和阿根廷进行的游击主义军事冒险，年轻人的生命之花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人亦因此在与政府进行的毫无意义的军事冒险中被白白浪费。同时“第四国际”也向爱尔兰共和军（IRA）给予了毫无谴责的支援，并追求许多其他类似的冒险。

然而不幸地是“第四国际”迄今没有从他们的错误有所学习，这正表现在罗伊在农民问题上对托洛茨基的立场所做的评价。他说到：“与其说托洛茨基分析的缺陷是‘社会学’上的不如说是战略本质上的：要考虑农民阶级作为一个‘小资产业主’阶级，他们的政治视野不会超越对于民主的追求，他们只能‘支援’ 无产阶级的革命。举例来说，他很难去接受中国的红军是由多数人口的农民所组成。正如许多俄罗斯和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的错误是没有做到有批判的去接受马克思在《十八世纪雾月政变》中关于法国农民是一分散的小资产阶级的评价，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应用此理论是具有非常不同的特点。然而，在他最后的著作《俄国革命的预想》（1939）中托洛茨基主张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阶级的正确评价并不认为农民作为非社会主义阶级具有‘绝对的和不变’ 的特征。”[9]

这些对于托洛茨基的批评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在农民阶层间的精确平衡，即在小农或产业主、贫穷农民和无地农工间，哪些阶层是可归入无产阶级的问题,在对大陆与大陆之间，甚至国家与国家间都是不同的。但是来自于马克思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不同种类特征的总的主张即使针对今天的新殖民世界仍然是完全有效的。马克思绝妙的思想早已经在各种革命中所证实，即只有工人阶级在有组织的大工业中由工厂和大车间的训练才能发展出必须的社会内聚力并最终发展出必须的政治觉悟从而能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转变。这即是俄国革命的经典表现，也甚至可以应用于其他如中国的并不“经典”的革命形式。

中国、南斯拉夫和古巴

事实上，托洛茨基关于中国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毛泽东1930年代的“红军”的描述，是相当明智而正确的。

他指出这个运动是对在1925-27年所失败的工人革命后的农村呼应。他说正在领导这运动的前共产主义者们会在一个时期内发展出一种对于工人阶级的怀疑和敌意，而且即使是在他们获取胜利进入城市后也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被农民阶层所在农村环境所决定，那是他们的基础所在。这不正是当红军击败国民党控制中国主要城市后所发生的事情吗？在他们占领这些城市之前，他们要求群众不要起来反抗，并警告罢工会将遭到惩罚。因此这里既不存在苏维埃，也没有独立的工人阶级或农民阶层的独立组织。托洛茨基对此预言到，正如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运动，中国的红军可能会胜利并可以击败国民党，但它仍然将保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这可能会导致建立另一个王朝，并退化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封建政权，由此新的反抗和农民革命会再次发生。

在中国事件并没有完全地按照这个样子所发生更多的是由于世界格局的力量平衡在中国的体现。长期以来虚弱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们随同被击败的蒋介石的军队逃离了中国大陆。在这所遗留的权力真空中，毛泽东代表获胜的军队领袖建立起了波拿巴式的小圈子。这一领导团体的小圈子在上层的不同的阶级间移动，由于来自下层的压力被迫对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进行没收。而罗伊所暗示的事实上远不如托洛茨基所表明的农民阶层，尤其是其中最低的阶层如贫穷农民等，其实完全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甚至在俄国革命期间，如约翰·里德（JOHN REED）在他的书《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指出，农民士兵们也将十月革命看作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开始。而且，在今天的部分新殖民的世界中，由于农民阶层心怀绝望而且不可行的小规模土地计划，使得“合作”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主张被证明是具有相当吸引力的，尤其是这主张是由植根于城市产业工人阶级中的党派所提倡出来的。然而，如果社会主义的革命能够实现并巩固，而且并在国际范围内对于工人阶级产生吸引力，那么农民——“农村地区”——会仍然需要在城镇地区寻找一个先进的力量。

马克思，以及随他之后的托洛茨基，说明了农民阶级的的社会局限性和它的分裂而等级化的特征，使之无法作为一个阶级而能够担任一个独立的角色。但是它可以扮演一个重要又必需的辅助角色以支持城市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而发动的工业化革命运动。毫无疑问地是，在工人阶级在社会中仍然是少数的地方，经典的工人阶级起义可能会被一个“农民战争的第二版本”所“补充”——即农民运动，其中甚至包括游击主义的元素。但是工国委根据托洛茨基的分析方法对它们之间做了清晰的区别。作为工业化地区工人阶级运动的辅助角色，在农村地区的人口中所使用的游击主义斗争方式是与相应在工人阶级中使用这种斗争方法完全不同的。这应该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是和ABC一样的基本常识，尤其是对于那些宣称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们。然而不幸地是“第四国际”在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上都出现了理论上的退化。在实践中，如果“第四国际”在群众运动中具有影响力的话，那么这可能导致在未来的灾难。

这也一样适用于“第四国际”对于“官僚化”政权的描述。他们宣称对于铁托治理下的南斯拉夫，古巴和中国的政权是持有批评的态度。然而，这些“批评”的基础都是接受承认这些国家是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如果“官僚主义”元素存

在的话，那么它们也是被认为类似于在俄国1917-23年还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时所存在的一种变异的“官僚主义”。厄内思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作为前“第四国际”理论领袖，坚持这一观点反对工国委的时候，对于这一分析我们从根本上不同意。[10]例如说，我们反对“第四国际”所提出的铁托是个“不自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说法。这包括当铁托在1949年与史达林发生冲突的时候，“第四国际”派遣志愿者前往南斯拉夫。然而，铁托事实上是个“民族主义的史达林主义者”，他通过与史达林的勾结来控制政权（因为铁托是模仿莫斯科的政权的形式），他反映的南斯拉夫官僚阶层的民族主义史达林主义者对于莫斯科的“老大哥”的反对。

相同的分析方法也被“第四国际”用于分析在1950年代后期和在所发生的中苏争端。在那一阶段，曼德尔相信在中国不在需要进行“反官僚主义革命”——即政治革命——因为毛泽东的政权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只不过带有轻微的官僚主义的变异而已。但是这一立场是完全站不脚的，根据现在所披露的事实，——实际上的那些罪行——毛和其继任者所做的是镇压和遏制了中国广大群众基本的民主权利的需求。

关于古巴，“第四国际”的领导人们犯了相同的错误。这场革命对帝国主义而言确实是极大的打击。我们以及“第四国际”都相当热心地支援了这场革命。我们认识到它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和新殖民世界所产生的巨大效应。然而，古巴革命的本质是略微不同于中国革命的，卡斯特罗政权仍然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但是群众没有拥有独立的手段去实现和控制政权，没有罢免和选举官员的权利，没有清晰的上层和下层工人间在工资差额上的限制。[11]我们始终如一地在帝国主义攻击中捍卫古巴，但是在同时我们号召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的制度，因为这是唯一能够保证古巴被帝国主义威胁和试图让古巴回归资本主义之时——在古巴， 拉丁美洲和在世界各处获得群众支持的保证。

现在看来当初在2003年夏天“第四国际”第15世界大会上所通过的一个决议是相当错误的，因为“第四国际”宣称：“我们一贯以组织自治，工人自治管理和民主政治的名义，与那些自己宣称为‘社会主义’政权但仍然对民众和工人进行压制的官僚主义政权进行斗争。”对于“第四国际”领导人现在做出的结论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但是很明白这显然并不适用于上述案例中。当一个政权的官僚主义特征已经清楚的显示的时候，作为事后诸葛亮提出批评是相当很容易的。而“第四国际”从古巴革命之初起，未曾提出一个清晰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分析。这包括对卡斯托罗所采取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措施和对与失去信用的巴蒂斯塔政权相比较而建立的对古巴人民具有大量好处的计划经济的支持。“第四国际”做了这些，但同时他们拒绝号召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其他为建立一个健康工人国家所必需的需求并推动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运动。

在法国失去的机会

在欧洲，“第四国际”的最主要的国家支部是在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联盟（LCR）。

从1995年以来的一些场合，包括在最近的选举中，建立一个新的群众性工人政党的决定性步骤的机遇是存在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工人斗争”（L0）看起来获得了相当抗议向右转的“多元左派”，即以法国社会党（PS）为主也包括法国共产党（PCF）， 的工人阶级和年轻人的支持。例如在2004年1月，法国地方选举前2个月，民意调查显示9%的法国人会投票支持LO/LCR，另外有22%的人会认真考虑投票支持LO/LCR。但是此后LO/LCR联盟遭遇了一系列的挫折。在欧盟选举中，它只获得了3.3%的选票并失去了它所有5席欧洲议员的席位.

当选民为了击败右翼党派而汇聚支持一个“看起来不那么邪恶”的偏左党派时，一些较小的左翼党派在短期内可能遭遇选票的流失。但是LO/LCR进行了一个毫不突出的竞选运动，他们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去解释推进斗争和清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他们攻击“传统左派”政党，如前社会民主主义的PS是“社会自由主义”——无论这是什么意思！但他们没有明确提出新的工人政党作为取代资本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道路。它被作为在选举后的事情而放弃了，于是同时另一个机会被丢失了。

真正需要的，是一场积极的竞选活动和为建立一个新的工人政党而制定的行动计划。就在2年前，LO/LCR的联合选举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获得了10.4%的支持，这表达了对即将下台的PS/PSC政府的反对。反对让-玛丽·勒庞（JEAN MARIE LE PEN）的运动是一个为建立一个新的工人政党而进行广泛运动的巨大机遇，而勒庞就是靠击败当时的总理若斯潘（JOSPIN）并取得第三位，而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的。

但相反地，革命共产主义者联盟依靠口号，“在街道上和在投票所内打败国民阵线”，从而没有呈现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里立场，并且允许工人阶级转移到来任总统希拉克身后 。并被广泛认为是完全腐败的希拉克在第一轮总统大选中只获得少于20%的选票，但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了82.15%的选票。这为第二轮选举胜利提供基础从而使右翼和此后形成的政府有信心攻击工人的基本权利，例如进行社会福利和退休金“改革”等。

在2003年5月和6月，曾经有另外一个机会去建立一个新的工人党派。反对政府进行退休金改革的抗议导致了近乎总罢工的一种情形，数百万人示威以反对右派的拉法兰政府。当时在每个人脑中都知道需要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以捍卫工人阶级和贫穷者的权利，没有人相信“多元左翼（Gauche plurielle）”（社会党、共产党和绿党）能够提供什么任何替代选择。

在2003年5月25日之星期天的大规模的示威后的一星期，所

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47%的被调查认为如果让社会党处理退休金改革问题既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47%的人在教育改革上也是如此，50%认为在公共健康改革上也是如此）。在示威中，工人阶级中部分阶层指责由于极左派在当年较早时候的总统选举中呼吁投票支持希拉克——并指出因此导致了一个强势的右翼政府。在反对退休金改革的运动之后，当工会领袖刚刚藉由避免一个总罢工而挽救政府的时候，注意力再次转移到了政治议题。[12]

今天的革命政党

“第四国际”不但在法国和其他地区犯了一些错误，该组织还摒弃了革命组织的基本原则，背弃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关于革命政党和革命国际组织的概念，反而偏好更为广泛的组织形式——类似义大利重建共产党（RC）和苏格兰社会主义党（SSP）。

然，在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后史达林主义时代，无论在组织方法还是政治理念方面，仅仅生硬地重复过去的法则是远远不够的。现在我们解释为何需要组织的时候，亦需要考虑到新一代会怀疑组织会“自上而下”。这一撮人明确反对史达林主义和（在组织架构层面上模仿史达林主义的）前社民派的官僚性质，有时并表现为彻底拒绝“组织”甚至是“政治”（至少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以至是“政党”的概念。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充分考虑这一问题。然而不幸地，有些组织出现矫往过正的情况，为了适应短暂和瞬间的群众情绪，而采取机会主义的做法。在此问题上，“第四国际”简直是拒绝过去的历史，背弃自己组织的历史，也背弃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向工人阶级斗争所作的贡献。

例如，“第四国际”最著名的支部——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者联盟（LCR）——的一名理论家丹尼尔·本萨（Daniel Bensaid）的文章评论道：“列宁主义最具争议性的特征之一——民主集中制。”13

在1990年代，如同今天一样，马克思主义受到猛烈的攻击。在列宁的党概念、其在俄国所建的党的特征，以及其在今天工人斗争的应用问题上，工国委作好辩论的准备。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无疑一直强调民主集中制在集中的一面，是因为在沙皇的专制统治下进行地下斗争。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是极度民主的，是历史上最民主的工人群众政党。如果没有这一民主成分——尤其在1917年的2月至10月间完全展示出来的——工人阶级或其最先进的阶层并不可能在党内找到自己的归属，群众也不会将希望寄托在布尔什维克上，引发十月革命。在1990年代的某一阶段，工国委考虑到，在史达林主义传统的官僚集权制的扭曲下，造成了反对民主集中制的偏见，所以提倡“民主统一制”的代称。然而，不久我们发现新名词并不能澄清概念，反而将之混淆，于是不得不转回使用列宁原来的名词。若果对民主集中制的概念进行充分解释，这一名词能反映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对其组织究竟需要什么。

工人组织需要最大程度的民主，尤其在现今资产阶级在全球散布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同时，资本家们又在经济体系和国家机器上集中其权力。以自发、半自发和无政府主义的组织概念，来反对资本家集中的权力不仅力有不及，而且对于未来十年将至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是致命的。一个真正民主而集中的革命政党绝非近似于史达林主义模式的，因为这是党内自我任命的领导人由上而下进行官僚集权统治的等级制度。在现代，这一模式也被前社民党领袖所模仿，如贝理雅的新工党。20年前，工党至少某程度上是英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媒介工具，现在这一政党成为了既不民主又官僚的噩梦。

的确，新一代的年轻人和工人并不想要一个受僵化控制、领导层无所不在并被认为无所不知的政党。例如，在英国建立一个新的工人群众政党，必然拥有过去工党在其形成阶段的时代和其“最好的日子”里的特征。换言之，因为最初此党必然代表众多不同的流派，所以应该具有广泛和联邦制的特征，并且欢迎所有愿意在基本社会主义纲领的基础上进行斗争的不同派别。

另一方面，一个新的工人群众政党可以以过渡形式存在，但一个革命政党是不能的。革命党代表了最有政治觉悟的革命力量的汇聚，当中各力量明白到需要建立一个斗争党派的萌芽，并在之后阶段争取大多数群众的支持。

今天这些革命政党将不同于20世纪初列宁在俄国建党时严谨的格局。这一革命政党将大量地从布尔什维克党的例子借镜，而且还会加上每个国家的过去经验 - 民主传统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式。党的内部会如何运作 - 通过辩论与讨论，党内有组织的少数派将获得言论自由，如何做到不仅在内部，也在公开地进行表达。在党建立的初期，以上的问题都将被充分地辩论与讨论。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绝对确定的：在最大程度的民主和讨论是必须的同时，当一旦作出决定后，集体统一的行动也是需要的。每一个认真参与罢工的工人都能理解这一基本概念，在罢工期间少数派需要有纪律地服从多数人的决定，并必须接受并执行决定。对于革命政党的行动而言，这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

但是，很不幸这一建党路线被“第四国际”所遗弃，并以极端松散的组织形式所取代，而且在建立群众性的国际组织上亦一样如是。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应具有什么特征，而且该如何建立呢？“第四国际”的回答是 - 彻底背弃列宁的教训，彻底遗忘托洛茨基的贡献。不幸地，他们机会主义地屈服于1990年代的压力下，并将这种做法延续至本世纪初。检阅一下“第四国际”领导人就过去经验、党性质和当今所需的国际组织等问题所总结出来的“成绩单”时，一切都变得清晰易见。最近“第四国际”世界大会上，其领导人出版了“一个国际主义的、多样化的，革命性的、战斗性的，并在群众中具影响力的新力量的章程。”他们解释：“这一主张意味着对于第四国际的任务的重要修正。这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这是第四国际成立时的目标），甚至不再是这个未来政党的中央核心。65年以来，这一宣言没有聚合各种革命力量，反而以团体破裂和分离来标志着。我们是众多托洛茨基主义力量的其中一个，是众多革命力量中的其中一

个。第四国际这样的时代——怀著作为革命先锋的愿景，拥有努力战斗的庞大支援、正确的分析以及在托派运动内部成功的战役——已经告终。”[14]

在别的文件中，“第四国际”表示希望采取类近第一国际的模式，一个广泛而多元化的组织，而不是明确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托派的国际。在1990年代早期，工国委与“第四国际”和其他组织讨论时，的确曾经建议，在托派运动和工人运动之前的新形势下，一般而言，建立一个类似于第一国际的组织或者论坛，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有利于澄清理论，并制订共同工作的基础。但我们从未视之作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正如马克思和思格斯对待第一国际的态度一样，此一组织为视为过渡组织，及后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向一个意识形态更为坚定的组织迈进。回归至第一国际的概念，并视为历史上的最终模形，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个错误。如果这样的一个组织能建立起来，我们将参与其中，但是我们不会解散自己的力量，但仍然会在这一组织内维持自己独有的思想、纲领以及组织。换言之，英国左派领导人物东尼·本（Tony Benn）和其他人所设想的，以全国性的新的工人群众政党构成“第五国际”，是不可能的。新的工人群众政党会由不同的团体汇聚起来，以建立一个联邦形式的组织，当中能够进行协调、讨论并采取一些共同行动。然而，对马克思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说，这绝非最终目标的组织模式。

显然，“第四国际”已经放弃了建立国际组织的思想，将其名字的含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搁置一旁。“第四国际”甚至断言自己没有成为“这样的政党的中央核心”和国际组织的目标，并断言托洛茨基在群众革命性的第四国际的基本概念为“失败”，以作为辩护理由。正如我们在《工国委历史上》所指，“第四国际”组织失败原因在于二战所带来的客观现实结果，以及“第四国际”领导人（在托洛茨基逝世后）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所犯的错误。工国委从不相信能够仅仅通过“努力战斗、正确的分析以及在托派运动内部成功的战役”，就可以令托派思想的群众性国际组织实现。[15]

一个革命性的新第四国际将是清晰思想的产物，以托洛茨基和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方法作为起点，并进行持续的更新和打磨，再加之新的群众力量。前提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和工人，通过自身经历而确切明白需要这一革命政党。

国际社会主义趋势 / 社会主义工人党

国际社会主义趋势（IST）和它在英国主要的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SWP）是另外一个在政治和战术上犯的严重错误的所谓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从而严重损害工人和年轻人结束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IST/SWP在整个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对“第四国际”采取了一个极端反对的立场，他们是相当极左和宗派主义的。但是最近他们也开始向右转化，并越来越采取与“第四国际”类似的立场。

IST/SWP关于柏林墙倒塌的政治观点从历史上那个转捩点以来是完全处于变化之中的。根据他们的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发生。他们如此天真而没有意识到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被这一系列的事件所影响。然而正如我们看到格林斯潘在早些时候的评论所指出的，这既不是资产阶级在当时也不是在现在的观点。而且，任何植根于工人阶级和它的组织的人都不能够失败到不能意识到曾经发生的事件—现在社会主义者所遭遇的困难并且将由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单独面对一系列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攻击。

国际社会主义趋势用他们“自愿主义”方式有效地挑战了政治领域的“重力”定律。他们通过首要吸引学生和极端化的小资产阶级的做法在短时期内他们带来了一些胜利，但他们的环境脱离于真正的工人阶级和他们的观点。他们对情况的误读来自于他们组织理论上的错误：他们的理论家，如东尼·克里夫（TONY CLIFF），所阐明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他提出的“理论”最初是应用于史达林主义的俄罗斯，东欧和中国等。这些思想与托洛茨基在他丰碑式的著作《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要点是完全不同的。工国委一贯反对他们这一理论。并通过泰得·格兰特（TED GRANT）的著作《反对国家资本主义》而进行了彻底的回答，而最近还有彼得·哈顿（PETER HADDEN）的《社会主义的今天而斗争：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问题的回答（The Struggle for Socialism Today: A Reply to the Politics of 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17]和萨沙·史丹斯（SASCHA STANICIC）的《哪条路通往社会主义（德文WELCHER WEG ZUM SOZIALISMUS）》[18]和其他工国委的出版物对此进行了回答。

虽然IST/SWP经常宣称它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对托洛茨基的理论遗产却具有决定性的分离，尤其是对应东欧和俄罗斯在史达林主义官僚统治下所关系的阶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们不能够被认为有一个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延续。

一个理论错误尤其是在苏联的阶级性质上的关键错误或早或晚会反映在政策，方法和组织上的错误。这一案例甚至适用于当史达林主义国家，苏联这一错误的原由已经崩溃之后。这显示了路线的错误。这相当清晰的显示了IST/SWP。根据他们的说法，东欧国家和前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他们的崩溃并不被国际社会主义趋势认为是工人阶级历史性的失败。这仅仅是“边缘性的变动”，一个资本主义的政权被另一个资本主义政权所替代。

这也涉及到国际社会主义趋势的德国支部的失败。关于1989年事件和柏林墙的倒塌，它描述道：“相对于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东德（GDR）的独立，社会主义者应该执行的任务是推动真正的工人斗争。在1989年12月初进行一场反对史塔西（STASI）的总罢工和统一的全民投票是可能的。一个革命性的过渡政府将通过一场总罢工而产生并可以充分地解散史塔西政权和旧有的权力机制并与科尔政府协商统一的条件。”[19]

换而言之，国际社会主义趋势的德国支部支持德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统一以及由此而给德国，尤其是东德和工人带来的各种问题。而计划经济的解体——虽然被史达林主义所破坏和扭曲——对于这一“趋势”将毫无意义。因此，他们认为这些事件对工人阶级的政治理解和政治觉悟水准并没有任何改变。

这一对于柏林墙倒塌后状况的超现实主义的解释与之前所提及的结论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些包括对于工人阶级内的、在工会内的、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尤其是当时在“共产党”内的先进阶层的观点。从长期来看确实如此，揭露史达林主义用它肮脏的各种手段，如清洗、大规模放逐、阴谋诡计等而使劳工运动蒙受污名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尽管存在史达林主义的凶残专制的特征，在东欧诸国和苏联存在的国有的计划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而言仍然是相当先进的。根据托洛茨基的解释，这是钢铁、混凝土和水泥的语言，并在最初阶段具有令人惊讶的增长率，至少这些经济显示出了国有计划经济对于过时的，混乱的和无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他们的解体使得工人阶级中先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层深感同情。而为了相反的理由，这一过程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战略家所庆贺。但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趋势而言，这竟然是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后果！

过渡纲领

管目前国际社会主义趋势形式上仍然坚持建立“革命党”的目标，但尤其在英国，它尾随“第四国际”，公然转向机会主义的路线。

似乎与他们在九十年代的政策截然不同。无论在政治上如何否认，现实早晚会体现出来。在九十年代末，国际社会主义趋势开始反对政治上的壁垒。社会主义工人党被迫调整以往的僵硬的宗派极左主义 - “不参与选举”、“打碎国家机器”等。哈顿在其小册子《社会主义的今天而斗争：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问题的回答》中，有力地指出这些错误。

根据1914前社会民主党的格局，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出“最高”纲领 - 号召革命和社会主义、“打碎国家机器”和“最低”纲领 - 日常改革。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宣传和鼓动中，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分开的。与之相反，托洛茨基根据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在三十年代提出过渡诉求的纲领。这一纲领是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在当时资本主义无法承受持久的改革。因此，认真为改革进行斗争将提出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

托洛茨基的“过渡要求”是工人阶级从现阶段的政治觉悟水准迈向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的桥梁。但是国际社会主义趋势以克里夫为首，拒绝这一思想。克里夫非常清晰表明其组织的观点：“托洛茨基的过渡要求背后假设的是，经济危机深刻得，即使是为工人生活条件进行最微小改良的斗争，都会与资本主义体系发生冲突。当生活反证了这假设，这一纲领的基础消失。”[20]

没有一个网领可以无视实际的历史状况而提出的。托洛茨基的路线在1930年代是有正当理由的。但是，克里夫没有理解的是，在1945年后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回升，带来了客观状况的变化，从而允许工人阶级赢得重要的改革。即使如此，与克里夫的断言相反，工人阶级实际上还是实行了托洛茨基所描述的一些过渡要求。例如，在一段历史时期，意大利工人通过“滑动工资表（scala mobile）”实现了按通涨比例增减工资的计划。在二战后，由于工会厂房代表的委员会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得以巨大发展，以稍有不同的形式局部实现了托洛茨基纲领所要求的“工厂委员会”。

但是，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所描绘出的状况在今天变得成熟。正如上文讲过，有机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形成，从而迫使统治阶级猛烈打击生活水准。这就意味着，为持续的改革进行斗争，将不免提出革命性社会转变的要求。当然，这并非表示工人阶级不可能再获取重要的短期收获，但这些收获只是暂时性的，性质上并非持续，而且资本主义将不免尝试重新将其剥夺。我们可以见证到法国统治阶级的顽固，尽管在过去十年屡战屡败，但仍然试图降低法国工人的生活水准，甚至打算取消工人靠过去斗争获得的35小时工作制。

因此，即使今天的条件不同，纲领的类型和当中许多要求在今天会有所不同，但当托洛茨基的方法开始受认可之际，社会主义工人党却将之拒绝。在过去社会主义工人党指责工国委尤其是英国的“战斗派”（现时的社会主义党）对“修正主义”投降。但这并非事实，我们坚定不移地将工人阶级的日常要求与社会主义的目标相结合，明确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提出的贡献。有时候，社会主义工人党也许会高喊“革命！”，但在大部分时间其日常活动仅限于最低纲领的口号，例如“向富人征税！”，与之相随的，就是其对“左翼”领袖人物毫不批判的路线。

另一个揭穿国际社会主义趋势的例子，是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成员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撰写的一本小册子《反资本主义（Anti-Capitalism）》，该书大幅描述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但没有提出一个纲领性的提案，也完全没有提及“社会主义”，亦无号召国有化跨国公司，将之置于工人的民主控制和管理，更无提出用一种民主计划经济以取代市场体制。他将反资运动和劳工运动视为两个完全分离而无法结合的事情来分别处理。至于拥有社会主义纲领的新工人政党的必要性，也未被提及。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选票至上主义

过往，社会主义工人党指责工国委为“选票至上主义”，但这并事实。

例如，无论在1980年代利物浦地区，在过去和今天的高云地利地区，或者是在爱尔兰约·希根斯（Joe Higgins）成功的选举工程中，工国委都明确号召需要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相反，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其选举活动中并无清晰提出社

会主义。

从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在英国毫无批判地支持乔治·格拉维（George Galloway）的“尊重联盟”，就可见一斑。由于渴望选票上的胜利，使其反对宣传社会主义。其中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英格兰北部的约克大学教授兼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领导人阿力士·卡林尼克（Alex Callinicos），在2003年6月30日被邀请参加BBC4广播电台的“广播大楼（Broadcasting House）”的辩论节目，与英国资本家组织（董事长协会）的政策主管鲁丝·丽亚（Ruth Lea）和亲资本主义作家罗伯特·凯斯（Robert Kelsey）进行辩论。当节目讨论临近结束时，卡林尼克被问到对于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然而他没有一次提到社会主义。事实上，他听起来更像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回答只是简单地说：现在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时候了，并继续说“我们将建立一个的替代模型”，又承诺道：“我们会想出一种更有希望的方式来运作世界”。最后，当其他辩论者挑战他，指他主张类似于史达林主义的北韩时，他只说“会有很多更好的方式去运作世界”。问题由此而来，卡林尼克是否成为了一个“后社会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工人党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局部圈子内讨论，而不适合在全国性的广播电台？

在他最近出版的书籍《反资本主义宣言（Anti-Capitalist Manifesto）》中，卡林尼克提出的诉求是完全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他要求对控制资本，但没有提出国有化大银行和大工业。书中看似有提及经济计划的问题，但并不是作为过渡纲领的一部分。他的“过渡纲领”也不包括任何对于劳工运动的诉求，也没有为工人阶级的战略提出方案。卡林尼克写道，这些诉求应该意味着此刻的改良，但应该开始创造一个“不同的社会逻辑”。

在2004一场关于需要在德国建立一个新左翼政党的讨论中，国际社会主义趋势团队亦显示出类似态度。他们不仅公开反对为新政党制定社会主义纲领（在2004年6月该新政党名为“选举的替代 - 工作和社会正义”），甚至反对在组织内对此问题进行辩论，声称这将成为新分子加入的障碍。至少在三个场合，国际社会主义趋势成员公开反对工国委成员和其他人提出“制度问题”，并支持修正主义者。

在反资的斗争中，例如在热那亚，IST/SWP的主要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但没有尝试将之与社会主义世界的理念联系起来。工国委的国际书记处成员卜·拉比（Bob Labi）参与了这次示威，并评论道：“他们（在热那亚）的爱尔兰代表团有一张示威牌主张‘不要自由贸易，要公平贸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一个乌托邦的诉求，事实上是暗示要求“更好”的资本主义。”当这一口号受到质疑时，国际社会主义趋势的一名爱尔兰领导人回答道：“为什么你不能够享受这一精彩的活动？看看这里有很多人啊，别糟蹋它。”

“此外，国际社会主义趋势在德国的组织‘左倾’（Linksruck）为其成员发行了一份9页的特报，其题目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热那亚G8峰会抗议的简报》。虽然此文件强调以强大的地区根基去建立反资运动，但并无提出如何将之发展成社会主义的运动。事实上，在该简报内没有一次提及‘社会主义’一词。”

在英国，国际社会主义趋势多名主要发言人曾经明确反对使用“社会主义”一词。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林丝·日尔曼（Lindsey German）反对将之放入“尊重”（Respect）联盟的纲领内，因为据称“社会主义联盟”由于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而导致选举失败！不必说，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路线上有所转变，并不表示其对待其团体的方法和手段会有改变，相反是显得和从前一样蛮横。

另一个迹象显示国际社会主义趋势完全没有能力正确预测情况 - 卡林尼克作为克里夫死后国际社会主义趋势的主要理论家，在2002年3月写及关于“革命社会主义在过去20年内的孤立...”[21]这段时期包括英国1984-1985的矿工大罢工、由战斗派（The Militant）组织和领导的壮大的反人头税运动，在英国工党内围绕东尼·本的激烈剧变，以及一个强有力的左翼的出现，所有这些都在那时发生的！这段时期，孤立的并非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者，而是在真正工人阶级运动旁边叫嚣的宗派组织IST/SWP。例如，当利物浦市政会在1984年挫败戴卓尔，并从政府手上取得巨大的让步，社会主义工人党却在其报纸《社会主义工人》上谴责市政会，宣称工人阶级被“默西（利物浦）出卖了”。

相反，当客观环境对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者而言变得不利甚至非常困难时，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数十年来的首席理论家克里夫又是如何说呢？ 根据克里夫的说法， 九十年代仿佛是“以低速运转1930年代”。这正是俄国文学中的著名寓言中提及的，一个愚人在婚礼上唱葬礼挽歌，在葬礼上唱婚礼歌曲！此外，这一结论不仅在九十年代初（即柏林墙倒塌的政治反响尚未完全清晰时）被克里夫提出，而是贯穿甚至超过十年。由克里夫将局面粉饰为“没有改变”，意味着国际社会主义趋势的组织，尤其是（但不仅是）在英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激进化年代的大前提下，继续以狂热的态度去建立组织，使成员的流动率很高。他们没有考虑到广大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处于低潮，提倡过分简化的思想和口号，如“一个解答，革命！”。

在一段时期内，维持这一路线以建立运动是可能的，但会以牺牲内部为代价。当组织的展望有错误，并与IST/SWP成员现实的工作环境发生冲突时，必然会在组织内部引起疑问，后果是不免地从宗派主义转向机会主义，并在2001年克里夫死后进一步深化，还采取极端机会主义的路线。在英国，这表现为附庸左派人物 - 或者是一些表面站在左派立场的人物，例如在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被逐出工党后，以及他参加2000年伦敦市长竞选期间。但现在利文斯通已经成为贝理雅主义的一支硬柱，为他重回工党铺下道路！在他重回工党之后，在2004年市长的选举期间，在投票率上升的情况下，利文斯通的第一选择票虽然在绝对数上上升17,600票，但得票率却从39%降到了34.5%。在2004年6月，利文斯通可耻地声称，他将会破坏伦敦地铁工人的罢工，因为工人不接受他在工资谈判中苛

刻的协定。

由工国委英格兰及威尔士支部——社会主义党，为了为未来新工人政党打下基础，谨慎地尝试组织的“社会主义联盟”，也因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介入及其宗派主义的手段而遭到破坏。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加入前，“社会主义联盟”曾经是众多不同的小规模组织（除了社会主义党以外），主要为选举目的而进行统一战线策略，是一次真诚的尝试。但这一切都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介入后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工人党恃着自己在伦敦的成员数量（尤其是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员）以及党的物质资源，坚持建立一个由其预先规定的单一阵线，以反对其他希望能站在共同选举阵线之上的左翼力量，例如在2000年伦敦市议会选举中，由铁路、海事和运输工会所支持的“反对地铁私有化”运动，以及其他单一议题的运动。

马克思主义者在广泛组织中的工作

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在资源上富有，但在意识形态上却相当贫乏，尤其是当需要精心制订复杂的战略和战术，为新的工人阶级组织铺下基础的时候。

社会主义党主张在社会主义联盟内部采取联邦式的路线，依循这路线可以发展共同理念和相互信任，并通过辩论而达成在纲领上的真诚协议。社会主义工人党彻底拒绝这一建议，并企图将自己的路线、纲领和方法强加在社会主义联盟上，但在任何英国工人阶级认真的斗争中，他们的方法没有一个被证明是成功的。

但这没有阻止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像孔雀自吹自擂自己党的“重要性”。这可以通过约翰·里斯（John Rees）针对梅里·史密斯（Murray Smith）（一名前工国委成员，当初他离开“第四国际”加入工国委，然后再次躲在“第四国际”的行列）的答覆反映出来。在关于“广泛的党派、革命党派和联合阵线”的争论上，里斯说道：“史密斯认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发展与阶级斗争的状况只有些微关系似的，但事实上它是处于斗争的中央核心，并备受公众讨论的。”[22]

在什么方面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处于“中央”的？工国委的英国支部——战斗派（The Militant）曾经领导过两次群众战斗反对戴卓尔政府：1984 - 87年在利物浦的运动及反对人头税的斗争。在利物浦，这场运动包含了工人阶级中牢固的产业，他们不仅支持战斗派的中央战略和战术，而且作为政治组织整合在战斗派之下，在一个阶段中，在默西塞德地区有1000人组织在其旗帜下。在英国矿工罢工期间（1984-85年），我们总共招募了500名矿工，并在全国矿工工会（NUM）的重镇里发挥了重要影响。在这段时期，社会主义工人党公然谴责其他正在领导斗争的组织，有时更使用刺耳的批评语调，有时则采取彻底消极的语调。例如在反对人头税的斗争中，克里夫在苏格兰的一次会议中，曾经恶名昭著地指出，不支付人头税就像不买巴士车票一样！结果，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反对人头税的斗争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在全英反对人头税国家联邦委员会中，没有一个代表成员。但这没有阻止社会主义工人党事后在战斗派的支持者背后，无论在英国还是国际上，宣称自己“真正领导了这场运动”。

结果是，正如里斯所承认，事实上他的组织20年来被排斥在工人阶级真正的发展（包括挫折）之外。相反，他们怀着（尤其是在1990年代）长期激进化的希望来支撑，但实际上这段时期激进化并不存在。在一段短时间内，组织可以依靠不稳定的小资产阶级元素，而非工人阶级，在摆脱客观现实的束缚下取得增长。但是不可避免地，由于党内部政治图谱不能应对党员面对的日常现实，会为党员带来冲击，“结帐”之日不免会来临。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派会从最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彻底排斥工人阶级和左翼力量）发展成为机会主义。

这一现象反映在很多议题上：在IST/SWP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在“停战委员会”内的策略，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对于英国工党和其阶级属性的分析。正如他们自己所承认，IST/SWP已从一个立场转向另一个立场，如里斯所说的：“在长期经济增长的时期，我们最多只能建立一个像国际社会主义者（IS）这样的一个松散但是意识形态清晰的宣传小团体。”然后又宣称：“1968年IS开始成长，随后数年在工人阶级取得细小但真实的成就…成为了一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因此更为开放和鼓动性的工作，包括建立了大众报纸…从而成为一个更“列宁主义”式的党组织。”[23]而里斯所不愿意承认的，是这种工作方法不免会导致他们与一些组织内的工人发生冲突，而使后者迅速离开。例如，在莱贾斯特和其他地区的“基层组织”里，只因矿工们显示出最轻微的独立性，便被克里夫武断专横地解散。那些曾经加入这些团体的成员被立即邀请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但只有极少数人应邀。

民主和政党

社会主义工人党从不能够容忍在他们的组织内部存在反对派。

然而工国委和战斗派,虽然被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其他组织指责为“垄断”但经历过大量的派别斗争并且允许各派别实现充分的权利。这既发生在1992年格兰特分离之前，也发生在1990年代后期工国委苏格兰支部的领导层雪利丹 - 麦可比离开之前。而在英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这种机会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他们不断地进行中止权利和放逐。

例如2001年将国际社会主义趋势（IST）的美国支部，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SO）开除出去的案例。由于对国际社会主义趋势的领导层（即基于伦敦及其周围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反对，使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宣称有1000名成员）被事实上完全开除出去，只留下了极少数残余的对国际社会主义趋势的忠诚分子。同样的命运也被赋加于对国际社会主义组织表示同情和支持的成员，如希腊支部的大多数成员。

在建立国际社会主义趋势的时候，克里夫宣称其不像其他

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国际”。他说道它将更为民主。它没有国际性的结构，没有对于国际组织架构和国际领导层的选举。据称它的任务将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趋势这个大伞下松散地捆绑起各个国家的支部。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层和美国的国际社会主义组织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意见不同，这完全成为虚假的。英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层决定着“路线”，任何对此反对意见将遭到纪律处分，而且没有任何可以借助的支援如通过民主结构进行讨论，或者申诉，或者推翻对他们决定的可能性。换句话说,这一所谓的松散、表面上“不僵化”、因而更为民主的国际组织在实际上恰恰是相反的。它允许其中最主要支部的领导层，英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可以独断国际社会主义趋势其它支部的政策、纲领和组织结构。你能够用这种方法建立一个由“顺服的傻瓜”组成的组织，但绝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有能力独立地分析和达成决定的思考者和干部的组织，而这些能力是对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领导层而言不可或缺的必要素质。

相同的武断专横的方法也被社会主义工人党用于社会主义联盟内。这不可避免地与那些2002年时社会主义党（工国委）离开之后仍然留在联盟内的组织发生冲突。他们中的许多批评我们的决定，但是无可避免地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对联合阵线或者甚至是与左翼基础合作的基本民主程序发生冲突，因而无奈地步上我们的后尘 。

为了服务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目的,英国的社会主义联盟被残废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决定将它置于新形成的“尊重”联盟，它主要是为了2004年的欧洲选举，而在英国围绕被开除的前工党议员格拉维建立的一个机器。因为这一项目格拉维的主要推动者，社会主义工人党政策和方式的失败，使期待这一组织成为新的群众性的实际的或准备中的工人党的希望被毁灭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现阶段的机会主义的偏差更为清晰地是显示在关于工党的关系上。例如里斯说道：“工党在关键的意识上仍然是工人阶级内的：它的独立成员压倒多数的是工人阶级。”[24]当工人们实际上参与其中并且有限地决定政策和行动，只有一个长期没有在工党内经历的政治组织才可能做出这样一个难以置信的声明。

工党里工人阶级的参与是很少的，而且在英国许多地区工根本并不存在。我们并不是唯一进行这样宣传的；里斯应该读读其他左派劳工出版社的评论，如《论坛》经常性嘲笑似地报告工党党员和前工党党员今天如何看待该党的。那些不情愿地而粘附于工党的,主要是仍然保有历史惯性的老一代——缺乏别的真正可替代的选择，以及为求带领工党走上更为右倾的保守党道路的人——这是他们参与和投票支援工党的主要动机。但是如同我们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这个党派在它的基础上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了。在过去他确实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工人政党”，尽管其拥有一个资产阶级或者亲资产阶级的领导层但其基础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尤其是来自与工会方面的。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现在仍然支持那些处于的仍然在工党内的社会主义者和左翼应该继续留在党内。但是利兹·戴维斯（LIZ DAVIES），一个曾经一度在社会主义联盟内与社会主义工人党进行合作的前工党左翼成员，在她离开联盟之前曾经抗议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做法，并在她的辞职信中描述道：“在2002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大会的报告中，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提议‘修正主义者’应该留在工党内部——这些相同的人在2001年邀请我加入时候所说的展望完全不同。”

英国工会领导人们现今徒劳无功地妄图“重建工党”将会流产的。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利物浦的47位之一的前市议员，曾经提出关于利物浦工党的看法：“祝那些左派领导人们好运，如果他们希望尝试重建工党的，但首先问题是如何找到它。”在关于工党问题的立场上，社会主义工人党甚至在工会内最好的那些斗士们的右翼，例如铁路、海事和运输工会（RMT），它的领导层在苏格兰甚至实际地脱离了工党，而在英国的其他地区它也可能这么做。由于工国委成员在消防员工会（FBU）北爱尔兰支部的内部决议的推动，消防员工会也采取了相同的决定。这都发生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它的支持者们陷于浑浊的水中而无力自拔的时候。与其清晰的表明立场，并建议脱离亲帝国主义、腐败的前工人政党——工党——并开始从新另立政党的工作，社会主义工人党只是提出工会政治献金的“民主化”。

社会主义工人党今天的观点类似与十九世纪后期被误导工人和保守工会领导人的主张，工人阶级应该保留作为自由党的尾部并“重建它”！相同的观点——“较少邪恶的理论”——也在美国被应用于支持民主党以对抗布殊。工国委的美国支持者强烈地反对这点一观点：“这一观点不仅仅是适用于2004，也适用于2008、2012、甚至有需要的话直到3016。”换而言之，支持“较少的邪恶”的理论是反对工人阶级独立建立自己阶级的组织并将他们永久地束缚在资产阶级党派的“外衣”上。

社会主义工人党等同于幻想的“修正主义”的企图（毫无疑问这确实存在于工人之中）和新工党的支持是虚假的。当工人阶级遭受着来自老板和他们政府的种种攻击，新工党寻求的是对削减生活水准。当社会主义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正式从工党的政治备忘录中移去之时，在过去的修正主义的时代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广泛的幻想，例如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的不断的提高。但是这如何等同于新工党的行为呢？这个政党事实是作为邪恶的新自由主义的媒介从而寻求进一步地降低生活水准。新工党、保守党和现在的自由民主党之间在接受私有化的问题上仅是在纸面上有程度的区别但实际差别非常小。

就象在以前的历史时期中的许多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社会主义工人党日益采取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而尝试能迅速获取重要政治影响力的捷径。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采用类似的手法；在1960年代该组织的“自由阶段”时期，他们机会主义地吸纳各种短期的和单一问题的运动而没有尝试技术性地将这与社会主义的选择相联系。但是他们现在的立场有所不同，他们进一步提升对于运动主要领导人的注意力而不是

激进的基础群众——如“尊重”的格拉维、过去的利文斯通、和反战运动中的重要角色等。

尽管他们在形式上宣称需要一个“革命党派”，但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工人党从他们原有的目标上有了迅速的演变。例如苏格兰社会主义党或者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者联盟，这意味着从以前立场上发生重要的变化。这会导致他们在未来日益尖锐的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基础上变成更为意识形态化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组织架构的有一定规模的甚至群众性的修正主义，左派修正主义或者甚至是中间派潮流的骨干力量。也许这不会导致他们完全正式地舍弃他们以前的“理想”，但在实践中，在未来他们将被归入时间的薄雾之中。今天为了进一步推进一个更为“激进”的广泛立场，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唯一能够接近工人阶级人民的道路，他们降低了他们曾经“革命”的语调，有效地边缘化了他们主要的“社会主义”讯息。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阶段社会主义的思想几乎已经褪色到消失。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创始人，弗里德利·恩格斯评论道，在法国革命结束巴贝夫（BABEUF）被处决之后，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被限制在巴黎和法国其他城市的“后巷”中。然而，这些思想的灰烬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和工人阶级在法国和其他地区的增长被引燃成小火然后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滔天怒火。法国工人阶级在1830年和1848年的运动中、在不朽的1871巴黎公社中、以及在二十世纪发生的戏剧性革命事件中，亲眼目击了工人阶级的力量随着社会主义思想无情的增长。相同的过程也发生在其他国家虽然历史性的格局也许有所不同。

工人阶级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夭折已经被许多人在许多场合宣称过，包括正如我们看到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今天的批评。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在1905-1907年的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之后所面临的局面，类似于今天马克思主义者在1990年代所面临的局面。列宁的追随者减少到了可怜的程度，他以及托洛茨基被迫与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做斗争，甚至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内部。列宁也反对各种极左主义思想的表现，例如对不民主的沙皇杜马议会的抵制——该政策原本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失败之后为大多数布尔什维克成员多采纳。

社主工人党的改良主

改良主义——将工人阶级的斗争限制在所谓的“可达成的目标”的纲领，并培育幻想认为社会能够在一个延长的时期内通过日益增长而转变——该观点自马克思的时代起就被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批判。

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时代，随着残忍的新自由主义的纲领对工人阶级的攻击，这些思想比他们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显得更为乌托邦般的虚无缥缈。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去捍卫在过去历史上所获得的一切或者不应该去争取任何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我们必须持续地解释即使胜利实现的时候，这只是暂时性的——一旦条件“成熟”，左手被给予的会被右手所收回。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工人阶级力量，以在组织内部和社会运转中贯彻社会主义的转变。

在1990年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力量在数量和支持上出现下降。但是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生存力，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即使在力量相对孤立的阶段仍然能保持其有效性。因此在工人阶级具有政治觉悟和合适的条件下事件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崩溃最终必然会创造变化。它能够并将这些思想带回到政治备忘录内。事实上正如早先解释过的，整个过程已经在途中，并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发展可能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之前就会有结果出现。当在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工国委也紧密地介入为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而斗争。

不象那些只准备站在一边进行评论的人或组织，工国委从未犹豫过介入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因此我们在一系列国家有所成就。我们的英国支部，正如以前提及的在很多领域都是先锋，现在拥有英格兰和威尔士内所有比工党相左的党派中最成功的选举记录。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党比英国任何一个左翼流派有更多的成员活跃于工会的全国委员会和基层之中。

同时，我们从来没有隐藏我们自己的思想和纲领，我们公开宣称我们自己社会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能够被许多发达地区的男女工人们所掌握。总之，这是为什么工国委能够集中那些最好的工人阶级的斗士在它的队伍中，尽管相队于要完成的任务仍然显的太少。

国际社会主义趋势，以英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为例，通常对于国际性工人运动保有怀疑。在英国的每一个主要罢工——如最近的消防员争论，地方政府工人罢工，以及在希斯罗机场的斗争等——当社会主义党的成员走到纠察线的时候，他们不断地面对提问：“你们不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吧？”只有当这些工人确信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我们的同志才能让他们听我们说话！在过去社会主义工人党对于左翼领导人的态度是极端贬损的。他们被社会主义工人党以极其极端的宗派主义情绪公然谴责为“叛卖者”。当然，这是在1990年代克里夫期间“缓慢回到1930年代”。由于他夸张的说法导致社会主义工人党可笑地宣称如果他们在1992年10月21日的矿工示威游行中有15000名成员和30000名支持者——大约10万人参与了那次游行——社会主义工人党能够领导一场向议会的进军，然后保守党的议员们将不敢支持迈克尔·夏舜霆（MICHAEL HESELTINE）的关闭计划，并使马卓安政府崩溃！[25]

正如我们在此稍后看到的，这次冲突和1990年代的现实状况导致社会主义工人党进行180度的大转变，它自己的领导人在新发现的“联合左翼”的需要下完全接受了左翼的领导角色。这涉及到对“停止战争联盟”激进的左翼人物和它们最新的阵线“尊重”政治上的臣服。他们在工会选举中也做了

相同的事情。例如在全国教师工会（NUT），社会主义工人党与非社会主义的为民主斗争工会而进行的运动（CDFU）一起阻碍反对唯一真正的左翼候选人，马丁·鲍威尔 - 戴维斯（MARTIN POWELL-DAVIES）。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政策上曲曲折折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在他们队伍内部产生冲突，从而使他们的成员一直持续流动变得恶化——这也成为该组织的一个特征，这可会导致大规模分裂。

正如他们开始右倾的变化，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开始向“第四国际”的方向移动。他们宣称“革命左派…包含那些在1980年代失败以来努力生存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在国际范围内最重要的,国际社会主义趋势和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26]。依靠这种手法上的变化，国际社会主义趋势希望能排除工国委—将它和它在一些关键国家内远比国际社会主义趋势规模大得多的力量从世界政治局势中排除出去。而且国际社会主义趋势大体上包含了大量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尤其是英国国内的。在这个时候工国委的社会主义党在数量上少于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在1980年代并不是如此）。然而社会主义党在工人阶级的各组织内有更为重要的位置，并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的政治觉悟有更大的影响。

“莫雷诺主义”倾向

其他的托洛茨基主义流派最初也不能够适应1990年代形势的变化。

他们其中的一些仍对工人运动中具有重要的影响的，是主要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的“莫雷诺主义（MORENOITE）”传统残余。托尼·索努瓦（TONY SAUNOIS）曾经拜访过这组织很多次，并总结了工国委关于该组织的观点：“来源于莫雷诺主义传统的力量，主要是国际工人联盟（LIT）和从他们国际中分裂出来的国际工人联合（UIT），在他们的组织内拥有英雄般的工人和年青人。不幸地是他们在关于现阶段特征的分析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他们不去面对发生了变化的客观状况事实，尤其是在史达林主义崩溃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仅是重复着来自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引句和口号，而没有真正面对客观现实世界或者工人运动现在的任务。这尤其表现在史达林主义崩溃期间。基于他们自己的文章《1990年的论题》，他们首先将1989-1990发生的事件看作持续的革命浪潮的一部分！在整个时期他们拒绝承认在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一切的本质和对此产生的国际反响。

“直到1996年他们最终承认俄罗斯是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1995年他们坚持说‘通过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而使官僚主义的崩塌是一高度积极的发展因为他摧毁了史达林主义的机制。’[27]同年，他们在巴西的政党，联合社会主义工人党（PSTU），简单地将其称为‘世界史达林主义机制的崩溃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一个战略性胜利。’”

部分由于与工国委讨论的关系，从国际工人联盟（LIT）中分裂出来的国际工人联合（UIT）比前者更早接受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但是不幸地是该集团的一个支部在对应这一状况时采用了更为机会主义的方式。正如在苏格兰的前工国委成员，他们现在倾向于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主义组织以取代建立一个独立革命党派。

大多数国际工人联合成员拒绝了这一路线，在巴西的一位著名的国会议员巴巴（BABA），与其他三名国会议员被卢拉从工人党（PT）中开除出来，因为他们反对政府对于工人阶级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攻击，如在养老金问题上的改革。国际工人联合巴西支部在建立一个新工人党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从而能为巴西的工人阶级开辟一个新的未来。

另一个组织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委员会（CMI），也被称为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是在1990年早期从工国委中分离出来的活士 - 格兰特（WOODS-GRANT）的小团体。我们将在其他地方探讨他们的思想和他们日益增长的机会主义。[28]

国际政党还是“邮箱”？

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必须建立革命党派，而且这些党派的特征是否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在斗争中推翻资本主义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世界。

个星球已经被一小撮残忍的资本家所控制。他们的政府被重现的美帝国主义所领导，而美帝国主义威胁着人类甚至这个星球的存在。英国的星期日报纸《观察家》披露了一份五角大楼秘密档的内容，该档提出了大规模的环境破坏的警告。它描述道，如果对环境的破坏不加阻止的话，气候变化将导致在英国从2004年起的未来20年内出现“西伯利亚式的冬天”。

伊拉克战争显示了资产阶级的“领导”部分——尤其是美国和英国，但也为包含义大利和西班牙内的其他国家所支持——为了获取能源而无所不为，尤其是中东第二大产油国的石油资源。所谓的伊拉克的“解放”实质上是一场残忍的占领，并且正向其产生反作用，这无法削弱我们关于在现代时期对于武断的、残忍的帝国主义行为方式，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分析。美国如果以它现在所支出的为标准很快花在军事装备上所谓的“防卫”费用差不多等于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在这方面投入的总和。这一行为实质是无视大众贫困和在世界一重要地区的生活状况正变糟，而且可以预见只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仍然继续维持，这会变得更糟。

不仅存在于国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资本的集权化以及资产阶级政府间合作以反对工人阶级的需求——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执行——所有这些都迫使工人阶级去组织相对应的措施。然而如果它们仅仅是早期未成形的，限制在某一“运动”中，他们最终会被击败的。大规模的反资本主义，反战运动动摇了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的统治圈和它们的基础。但是即使运动光辉如斯，没有组织将没有能力阻止战争驱动，更不用说推翻中央集权的资本。这已经很清晰地被参与这些运动

中的年青人和工人中的重要阶层所掌握。因此建立一个政党和一个国际的思想能够在这一阶段迅速增长起来。问题是：哪种类型的政党？而且马克思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这样的发展中起到怎样一个角色？

当这一切同时发生，苏格兰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们清晰地规划出建立一个更广泛的政党的需要。但是与此相伴的是以前他们曾经所属于的革命的核心变得不再是必须的。机会主义——对改良主义的采纳，尤其在一个非革命的阶段非革命的思想——从不公开宣称对马克思主义或者托洛茨基主义的背弃。伯恩斯坦在改良主义的方向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但仍然坚称他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在苏格兰的前同志仍然宣称维系着他们“革命的信心”，但是在实践中他们追寻着改良主义的备忘录。

我们指出了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在民族问题上，和尤其是在建立一个革命组织的需要上机会主义地修正他们的纲领。我们的预言在一个比我们所能正视的短的多的历史时间范围内被证实。正如我们所看的，来自于苏格兰社会主义党内部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ISM）的领导人提议应该击败这种趋势。但是即使在国际社会主义趋势他们的组织内部都遭到抵制，从而大大延缓了这一趋势。而且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仅仅是苏格兰社会主义党领导层中相对比较松散的一个组织。它几乎没做什么以阻止领导层机会主义倾向而滑向更为民族主义（支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苏格兰独立）或者一个“社会欧洲”的立场。与之相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反而仅仅是支持了这一过程。

类似的状况也存在于“第四国际”中——尤其是在它法国最大的支部中，革命共产主义者联盟（LCR）。革命共产主义者联盟公开地描述它不再是一个革命组织而类似于一个左翼的社会民主组织，虽然仍然包含有“革命派别”。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追寻廉价的支持率和选举胜利。这些机会主义政策与最奇特脱离于基于民主集中制的革命组织的组织结构相混合。现在极端松散的内部组织形式流行于革命共产主义者联盟内。

在国际平面上，有在同样松散的组织观念。“第四国际”世界大会的档《第四国际在2003年新调整的角色和任务》中描述道：“国际委员会（IC，前“第四国际”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必须在与对立面进行的辩论中扮演它在中心地位的角色。争论将是完全更为自由的，因为这一状态将使国家支部变得更为自治而不再需要执行由国际执委会多数所执行的立场。这甚至将在国际执委会内为外部组织参与我们的讨论提供更公开的机会，而不必要对我们尽任何组织义务。”换而言之，这个国际组织仅仅是一个讨论俱乐部，而参与者没有任何组织义务去执行通过辩论达成的政策。这与列宁所描述蜕化的第二国际有什么不同吗？只不过是一个“邮箱”，而且还是并不那么有效的那种。“第四国际”现在与其说是一个为动员年青人和工人中的先进阶层和通过他们动员整个工人阶级的国际中心，还不如说是一个进行国际档交换的组织。一个真正民主的革命的国际组织并不会在国际范围内以一种由上而下的官僚主义形式而达成“决定”。然而不幸地是“第四国际”在过去就是这么做的，正如其他那些在“托洛茨基主义”宽广的旗帜下的国际组织。英国的谢利·贺利（GERRY HEALY）和工人革命党是这样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领导人詹姆士·卡伦（JAMES CANNON）和约瑟夫·汉森（JOSEPH HANSEN）也是用这种方式。

在这些案例中，当领导人无法说服他们“国际”的不同支部的时候，他们通常没有进行适当的讨论和辩论下采取纪律措施。这是与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之下的第三国际（CI，共产主义国际）早期活动相反的方式。第三国际内有大量的群众性党派，例如在法国的案例，在任何国家支部有义务执行任何决定前都会在相当长的阶段内先进行对话和讨论。例如，托洛茨基曾经代表共产国际在“联合阵线”的问题上与法国共产党（PCF）进行了几乎长达二年的讨论，而PCF最初拒绝接受这一决定的。只有经过相当多的辩论并且得到了共产国际内的多数支援之后，第三国际的执行委员会然后才强制法共执行它的决定。如果不这么所的话，将把共产国际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国际组织降格成为一个讨论俱乐部。

任何组织或党派都有义务与革命党派的名字相符合。没有无责任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责任。进行充分的讨论和辩论,并且根据多数的达成决定是必需的，但是决定达成后必须根据纪律来执行。这对于一个革命党派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不适用与今天的“第四国际”。在一个比较宽广的联邦式样的过渡性的组织内，采取如此严厉的纪律是不适当的。但是对于一个宣称站在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旗帜下的组织，无固定组织形式的组织挫败了建立一支能够与工人阶级一起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性力量的整个目标。事实是“第四国际”以及苏格兰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层以极其轻率的方式舍弃了过去所拥有的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概念而替代为非革命性的类似于社会民主派的组织形式。“第四国际”简明地描述自己：“在新的国际组织中，第四国际将成为众多思想潮流中的一员。它绝对会保持连贯性。但新的特征将主要建立在新的纲领的基础上，而这一新纲领是建立于新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概念之上的更新。”[29]

对于“第四国际”而言，“第四国际”的名称并不代表其他的托洛茨基主义流派，包括继续跟从托洛茨基的群众革命性国际概念的工国委。在所有“第四国际”的书面材料和它的领导人中，人们可以发现对于政治机会主义的批评，例如澳大利亚的前托洛茨基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党（DSP），和其他仍然声称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的组织。但是“第四国际”自身的所犯下的同等问题就不是问题。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不得不与宗派主义和极左主义斗争，也包括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中央集权主义和其他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脱离的意识形态。但是今天“第四国际”仍然宣称：“我们坚信通过与其他激进的非宗派主义的思想潮流所合作，特别是新的党派和新的国际组织吸引的新力量。”[30]

巴西的阶级调和主义

这一路线所会导致的，在“第四国际”巴西支部的领导人物对待卢拉政府阶级调和主义中暴露出来。

卢拉迅速地右倾化，他们得出正确的结论，革命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成员弗朗索瓦·沙比特（FRANCOIS SABIDEL）写道[31]：“巴西工人党的领导层，曾经在过去的数年里宣称要进行阶级斗争与新自由主义进行斗争，但今天在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要求下正在执行着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于义大利的重建共产党（RC）也得出了相同的观点：“另一个例子是法士多·贝堤诺堤（FAUSTO BERTINOTTI）和义大利重建共产党领导层的转变，他们正在讨论与中左力量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即与‘橄榄树’（OLIVE TREE）力量和新自由主义的欧洲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进行合作。”[出处同上]由于这些路线的出现，实际上重建共产党已经同意与“橄榄树”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达成正式的协定。

关于巴西的案例，由于卢拉政府迄今为止的右倾化，所以在巴西的左翼人士中有一个关于卢拉政府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手的笑话：“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太过左倾了！”正如工国委的巴西支部所指出的，卢拉政府同时对教师和公务员的利益进行攻击—导致在2003年6月全巴西内发生的达30000人的游行示威。在2004年从业人员的生活水准有所降低，真实收入据预期下降了15%。巴西群众最主要的失望之一在于土地问题。到2003年底只有13000户家庭的土地问题被解决了，远低于卢拉曾经许诺的解决60000户家庭土地问题。而卢拉政府的土地发展部长米格尔·罗瑟多（MIGUEL ROSSETTO）恰恰就是“第四国际”的巴西支部——民主社会主义党（DS）——的成员，当其他“第四国际”支部的成员被从工人党开除出去的时候，他正在主持这一政治上的退却！在被开除的人员中最卓越的是海勒莎·海伦娜（HELOISA HELENA），她负责组建了一个新的党派，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这发生在当民主社会主义党仍然留在工人党内作为其一个支派，如前所述的在政府内保留着土地发展部长的位置，并在经济部内还有政治顾问。甚至民主社会主义党内的“左翼”也遏制他们在工人党内的要求，仅从经济部里撤走了那些顾问但没有号召辞去土地发展部长的职位。这现在已经被民主社会主义党内的成为大多数的右翼所挫败。所有这些都被“第四国际”有效地忽略了，他们预备了进行一场“争论”但没有对它的巴西成员进行尖锐批评，事实很明显它的巴西成员通过服务于资产阶级政府而背叛了巴西群众的利益。如同所有托洛茨基主义者知道的，“第四国际”巴西支部的行为与在1930年代导致西班牙革命脱轨中扮演致命角色的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有什么不同呢？但是，“第四国际”的错误是因为支援一个非“左翼的”政府，就象在1936年的西班牙在某一阶段名义上存在一个左派政府，但事实上“第四国际”支持的是一个公然宣布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前左翼党派，现在它所维持的巴西政府也是一个右翼政府。但是因为卢拉不能容忍在工人党内部存在任何反对派，所以海伦娜与其他三个议员——巴巴、约奥·冯堤斯（JOAO FONTES）和露西安娜·根罗（LUCIANA GENRO）一起在社会主义革命党（工国委巴西支部）的支持下推动建立新的政党的运动。

针对义大利的重建共产党（PRC）“第四国际”维持着相同的外交沉默。一方面，正如近来2003年夏天他们的世界大会上，“第四国际”宣称欢迎“由重建共产党和苏格兰社会主义党之类组织所带来的突破性的进展”。[32]在义大利重建共产党问题上，当其成立的时候，毫无疑问它体现了一个重要性的突破，但那是在1991年！它没有实现义大利工人阶级中那些因为政治上的蜕化而机会主义的领导层而积极反对前共产党（DS）成员的根本希望。重建共产党曲折前行从左倾变得不那么左倾，而且在过去的十年中党内“第四国际”的成员在领导层中形成了自己的派别。现在贝堤诺堤通过与“橄榄树”的联盟而向右派开放组织，在重建共产党的内部“第四国际”短暂性地表现出了反对。但这是以最混乱和最语无伦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例如，自从2003年6月底起他们说道，“这里存在着开放性…在与重建共产党和现在与‘橄榄树’之间存在问题的新联系，反映出一个由冲突和社会对抗的真相所呈现内容的主题选择性。这不仅是两个主体间的主题关系,而是在几个伙伴之间的关系,所以对各种运动都是采取开放的形式并由这些运动自己来决定选择。”[33]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第四国际”什么也没做来协助重建共产党的成员应对贝堤诺堤可能的右倾行动，尤其是针对那些并不活跃的重建共产党支持者们。与之相反他们的表现象贝堤诺堤的支持者一样，当重建共产党右倾转向“橄榄树”时而被震惊。由于义大利存在的政治真空，即使出现了右倾化的动向，重建共产党仍然可能获取选举支持。然而当并不活跃的群众给予重建共产党支持的同时，那些曾对它充满期望的活跃的工人们将对此反对或者变得惰性而不活跃，甚至一部分会离它而去；所以即使当它的成员基础变得衰弱的时候，它的选举支持率也可能会上升。事实上这里有一些证据证明这已经并正在发生。这并不意味着重建共产党的历史篇章已经结束了，但是随着它右倾化的演进，对大部分寻找社会主义和革命道路的青年人而言它将不再是具有吸引力的选择。

即将发生的革命事件

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层的角色任务是要预见可能发生的事件和追踪其相关发展，包括调查和了解政党、它们的纲领和它们领导方式的政治弱点。

不可避免的是，除非这些党派的领导人被有觉悟的阶层所控制和被马克思主义思潮所影响，否则他们可能向右翼滑去。就这一标准而言，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失败了，只要它继续维持现有的政治轨迹失败就不可避免。但这不意味着建立具有革命核心的代表工人阶级的群众性党派的可能性被排除了。这也绝不意味着新的群众性的国际组织，正如工国委成立之初所展望的那样，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恰好与之相反，

当初工国委成立之初的那种政治条件（即如1968-76年代时候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和具有战斗力的新一代人的出现）将被这个新世纪最初十年里即将发生的爆炸性事件所超越。

2000年代最初几年的形势正类似于曾经在20世纪最初所发生的情况。在一系列战争中最具有灾害性的战争的是伊拉克战争，其中包含着有害的种族主义倾向，经济混乱和可能的危机。然而其中也含有无法比拟的全世界大多数人口对于物质丰富、生活和平、社会和谐并能充分发展和解放所有人的才能的社会的向往。但是这样的世界不可能在过时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实现。或早或晚，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世界人民中的绝大多数都将清晰地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的变革将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是由勇敢的少数先行者准备的。他们总结出对于这种变化的向往应该基于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一个有觉悟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派，和与之相对应的组织。这是工国委在1974年的立场，这一立场在“现代”的今天仍然和在30年前的时候一样符合形势需要。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已经看见“社会主义全球化”萌芽的出现，但这只有通过一个革命的群众性国际组织才能实现。这绝非是在各种小团体间进行什么毫无结果的宗派斗争。这要求在群众运动之前先进行一场思想战，以在意识形态上对工人阶级面对的问题提出清晰的答案，并包括由此得来的所有策略和组织上的推论。

参考书目和出处

1. Remarks by Alan Greenspan at the Bundesbank Lecture 2004, Berlin 13 January 2004. From the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Review’, March 2004.

2. Karl Marx & Fredrick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3. Ibid. p.52.

4. Bob Woodward, ‘The Agenda: Inside the Clinton White House’, 1994.

5.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October 2000.

6. Vercammen, ‘The question of the party: Trotsky’s weak point’,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October 2000.

7. Michael Lowy,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October 2000.

8. Ibid.

9. Ibid.

10. See ‘Cuba: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 Debates on the Revolution and Cuba Today’, CWI Publications, 2000 or visit socialistworld.net

11. Ibid.

12. Karl Debbaut, ‘France: Workers on the move’, Socialism Today, June 2003. Can also be found at www.socialistworld.net/eng/2003/06/28france.html

13.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November 2001.

14. ‘At the heart of the anti-capitalist combat… Relaunch, opening, regroupment and repositioning’ Francois Vercammen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349 - May 2003

15. Ibid.

16. Ted Grant, The Unbroken Thread, June 1989.

17. Available on www.marxist.net

18. ‘Which Way for Socialism?’ 2001, available (in German) at www.sozialismus.info

19. First published in ‘Sozialismus von unten’ (‘Socialism from below’), Number 2, November/December 1994.

20. Tony Cliff, Trotsky: The Darker the Night, the Brighter the Star, p. 300.

21. Alex Callinicos, The Anti-Capitalist Movement and the Revolutionary left, March 2001

22.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Journal’, Winter, 2002.

23. Ibid.

24. Ibid.

25. ‘The SWP and the Crisis of British Capitalism’, 1992.

26. Alex Callinicos, The Anti-Capitalist Movement and the Revolutionary left, March 2001.

27. ‘For the Re-building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LIT and the Workers’ International’ (published in English), December 1995.

28. See ‘Revolutionary Socialists and the Venezuelan Revolution’ at www.socialistworld.net and ‘Militant’s Real History’, at www.marxist.net

29. ‘At the heart of the anti-capitalist combat… Relaunch, opening, regroupment and repositioning’ Francois Vercammen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349 - May 2003

30. Ibid.

31. ‘A New Force’,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February 2004.

32. ‘Fourth International: A Congress of Optimism’. 2003.

33. Livio Maitan,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September 2003.

一个社会主义世界是可能的！

“工国委的任务是帮助创造条件来形成这样一个国际组织。但是这只有建立在对过去历史上经验教训的学习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尤其是对于以前国际组织失败的教训的学习。建立这样一个群众性国际组织的重要一步是在各个国家范围内建立群众性政党。直到这样群众性的政党产生，那么国际性组织的框架才会产生。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群众性国际组织的胚胎只有在爆炸性的时期到来时才能够产生。我们相信工国委能够在这一过程扮演重要的角色。”

——彼得· 塔夫

工人国际委员会
中国、香港及台湾支部　出版

网页：www.chinaworker.info
电邮：socialist.hk@gmail.com
Facebook：www.facebook.com/socialistaction

捐款户口：
（恒生 Heng Seng）788-119204-668
（中银 Bank of China）012-932-1-017935-6